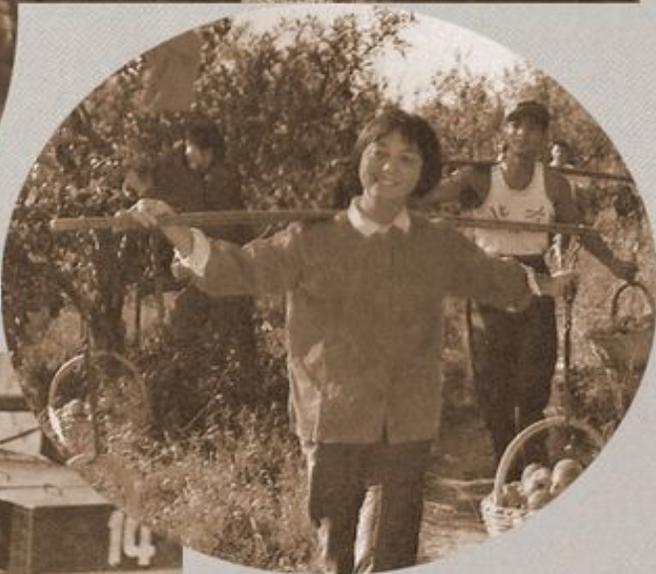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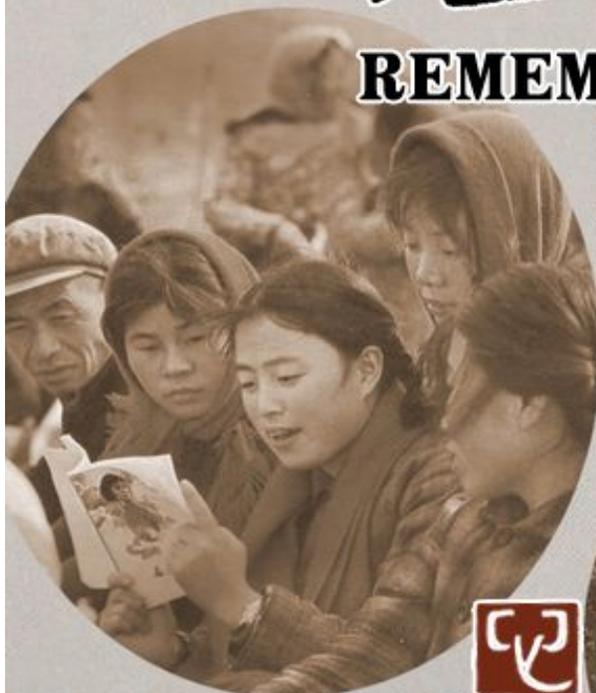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5年11月15日第20期
总第14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左上：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师生，到农村开门办学，并协助生产队办起了图书室，这是学员们在向社员们介绍新书。

右上：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给北大哲学系学员讲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批判邓小平散布的唯生产力论。

中：北大西语系师生在学工半读基地艰苦创业。下：北大国政系学员在木城涧煤矿听老人介绍矿史。（人民画报，1976-7）

《记忆》143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六）

目录

【专稿】

常 风 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和评价人物

——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评论】

胡宗式 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

【述往】

贡安南 怀念与思考——我的老师杨晦先生、赵齐平先生

陈金松 北大汉中分校的一段生活回忆

俞小平 文革高潮，书山探宝

俞小平 我参加了1966年7月29日的大会

何子溪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废品收购站寻宝记

叶成炯 令人难忘的收音机

【资料】

1.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的讲话（1967年4月14日）

2. 陈伯达1967年6月5日的讲话

【读者来信】

1. 敖本立纠错 2. 漂木谈章铎所著《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

3. 荷兰小庄谈当年看电影 4. 拾之：电影局所在地非冯恕所捐

【版权声明】

【专稿】

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和评价人物

——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

常 风

《记忆》杂志第139期刊登了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此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些有关北大文革史的资料，对研究北大文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但是由于作者完全站在同情孙蓬一的立场上，引用的资料基本是对孙蓬一有利的，所以文章的结论是片面的，不真实的。笔者认为，作为文革的研究者记述历史，评价人物，应该客观、全面、真实，不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为亲者讳，否则将会误导读者，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

本人是北大文革的亲历者，1966年6月从“四清”的农村回到北大到1970年3月毕业，见证了北大文革三年多的历程。以下谈谈我对孙蓬一问题的看法。

一、 孙蓬一在文革中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聂元梓在文革中秉承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旨意，在北大一手遮天，践踏民主，镇压群众，干了很多坏事，文革后受到刑罚。孙蓬一作为北大校文革的负责人之一和聂元梓的主要助手，追随聂元梓，助纣为虐，也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其中比较突出的有：

1、 攻击、反对邓小平同志，打击迫害邓朴方

孙蓬一没有赶上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字，在1966年11月8日，由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贴出了《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这张大字报攻击邓小平1956年反对所谓个人崇拜，1962年刮资本主义黑风，宣扬黑猫白猫理论，1964年反对批判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字报的重点是揭

发邓小平在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包庇陆平、打击左派，制造了“国际饭店会议反革命事件”；

并且点了常溪萍的名（常是上海市委文教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说他是邓小平包庇“社教叛徒”。以此为她准备去上海揪斗常溪萍制造舆论准备。

这张大字报出笼后在北京和全国造成广泛影响，传抄者转印者很多，起到十分恶劣的作用。以下是刊登在北大文革会大字报组编印的大字报选（四）上的这张大字报的全文：

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权，我们就有一切，失去政权，也就失去一切。要使我们的政权成为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就必须坚决执行最高指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我们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而且地位愈高者危险性愈大。

我们认为，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罪恶活动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五六年，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公开推销赫鲁晓夫集团的反动黑货，大肆吹捧苏共二十大，大反所谓个人崇拜。说什么“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廿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谈到关于领袖对党的作用时，非但闭口不谈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党，却大反所谓对于个人的神化。说什么“苏联共产党第廿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最后则赤裸裸地反对我们对我们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说什么“个人崇拜是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定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一九六二年，当我国由于苏联的破坏和天灾的袭击，使经济发生了暂时困难，邓小平便趁机带头大刮资本主义黑风。他在团中央的一次会上，公开鼓吹在农村恢复单干，说什么“不管黑猫白猫，能逮耗子的就是好猫。”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下，一九六四年我国文化领域内，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斗争。由于周扬之流的从中破坏，运动搞得极不彻底。可是，就是这样，也大大激怒了邓小平，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漫骂革命派对资产阶级老爷们的讨伐，公开反对文化革命。据黑帮分子万里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上透露：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上，曾对当时的文化革命作了这样的描绘：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演戏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也不让演！邓小平自己则污蔑革命派说：“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对人家一知半解，抓着个小辫子就批判半天，好自己出名。”邓还说什么，“学术观点，教育观点不一致不要紧，各种观点可以长期共存。”

邓小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坏四清运动。对北大社教运动的扼杀，是一个典型事例。

彭真是扼杀北大社教运动的罪魁祸首，这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个彭真。彭真只是一帅，帅上还有一帅，这就是彭真后台之一邓小平。

一九六五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在彭真亲自指挥下，前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议。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实。陆平、彭珮云在会上对北大的社教运动疯狂反扑。陆平的反革命言论传到北大后，遭到了革命派的愤怒反击，正在陆平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绝境时，这时一方面彭真出场，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下令停止争论，即所谓“泄两肚子气”；另一方面邓小平则说他“欣赏彭珮云的发言”；夸奖陆平的反革命言论“态度是好的，意见

是正确的”。

继之就由邓小平召集了所谓三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小平一面自称他看了北大社教运动的全部简报,但同时却颠倒黑白地为北大社教运动捏造了三条罪名:一曰把问题的性质搞错了,一开始就以烂掉了的单位对待,搞了夺权斗争;二曰没有实行三结合(即未与陆平黑帮同流合污);三曰斗争方法上有严重毛病(即所谓对陆平黑帮搞了过火斗争)。为了嘉奖陆平彭佩云的反革命“功绩”,会上决定让这两个家伙参加工作队的八人领导小组。同时还委托万里这个黑帮分子,召开反革命的第一次国际饭店会议。万里在会上动辄就是总书记如何如何说的,以此来给革命派施加压力。

在三月三日的所谓中央书记处的会上,邓小平还明目张胆地篡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廿三条》。《廿三条》中明文规定:“逐步做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邓小平却擅自决定机关、厂矿、学校的四清,工作队要一进门就与干部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与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要结合起来)。这里不仅把“逐步”改成了“立刻”,而且实际上“三结合”也给改成“二结合”了。象陆平之流的黑帮分子,如果工作队一开始就与之结合,试想,群众又如何发动得起来?结合起来,除了搞反革命,还会搞出别的名堂吗?可见,邓小平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其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国际饭店的反革命会议,尽管召开了,陆平黑帮被打散了的反革命阶级队伍也算重新拼凑起来了,但工作队的领导权还操在革命派手里。因此,要彻底镇压北大的社教运动,就必须夺取工作队的领导权。于是邓小平就利用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头号叛徒常溪萍的告密书,下令召开了镇压工作队革命派的民族饭店黑会。撤了队长张磐石同志,换上了黑帮分子许立群,常溪萍也被塞进了工作队的九人领导小组,革命的工作队于是成了反革命的还乡团。一九六五年我国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之就在我校发生了。常溪萍至今还有恃无恐,恃的就是邓小平。

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又与刘少奇一起,制定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罪上加罪,罪莫大焉!

邓小平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铁证如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所参与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已破产,但我们还必须痛打落水狗,把他的反动面目予以充分揭露,彻底清算他的罪行,肃清他的影响。

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要把他打倒,使他永世不得翻身。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聂元梓 白晨曦 孙蓬一 李清昆 夏剑秀 宋一秀
陈葆华 李玉英 傅治文 杨文娴 徐云影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其后,在校文革主办的校刊《新北大》上,连篇累牍的刊登了多篇丑化、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文章。聂元梓、孙蓬一和北大校文革在文革中一直严密监视邓小平子女邓朴方和邓楠的行动,企图把邓小平说成是通过子女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黑手。1967年10月12日《新北大》第四版,署名“红旗兵团横扫千军”的文章《彻底粉碎北大老保翻天的逆流》中写

到：“坚持反动立场的黑帮子女，没有认识错误的保守势力，一有风吹草动，就企图反攻倒算。邓小平的大少爷邓朴方，叶飞的臭小姐叶葳葳，刘志坚的儿子，廖沫沙、赵凡之女等，都是倒聂、倒孙的干将，他们对其反动老子从不揭发批判，甚至对抗群众对其反动老子的批判斗争。”

聂元梓、孙蓬一和他们控制的新北大公社为了打击对立面组织井冈山兵团，还把参加了井冈山兵团的邓朴方的同班同学张景元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企图以此把井冈山兵团与邓小平联系起来，给井冈山兵团加上受刘邓司令部操纵的罪名，从而一举摧垮井冈山兵团。1968年5月23日《新北大》178期第一版刊登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关于彻底砸烂操纵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一贯反抗中央、反抗中央文革的反动小集团的第二号公告》中说：“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景元，是一个卖身投靠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小蛆虫，文化大革命以来，张景元通过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接受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系列黑指示，张犯多次丧心病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明目张胆地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挑战，反革命气焰嚣张已极。”并在第二版上刊登了《打倒井冈山兵团反动小集团主要骨干、反革命分子张景元》的文章。

1968年4月经聂元梓、孙蓬一（北大校文革第一副主任）多次策划，成立了“东方红专案组”，先后抓捕邓朴方、韩琴英、颜品忠、樊立勤等11人，把他们打成“以邓朴方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邓朴方多次遭到严刑逼供，每次审讯都被蒙上眼睛，遭受铅管、电缆线拧成的鞭子毒打，逼迫他交代是怎样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专案组在拷打逼供一无所获的情况下，宣布邓朴方是“反革命”，并威胁说：你的罪行是严重的，不交代是没有出路的。邓朴方经过严刑逼供、威胁，被逼跳楼，致终生残疾。校文革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逃避罪责，急忙编造一份“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控制北大运动”的“绝密”简报，上报江青和康生，致使邓朴方致残后，仍遭受数年的非人折磨。¹

聂元梓和孙蓬一犯下的这个错误可以说是在他们所有的错误中最致命的，也是导致他

¹ 何洛、孟金：《〈聂元梓回忆录〉指误》（二），载《百年潮》，2011年第2期。

们在文革后被判刑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阮铭1977年对孙蓬一说的：“邓小平要出来，第一个就要拿你这样的人开刀！”¹

2、 与聂元梓去上海，颠覆上海市委，迫害常溪萍致死

1966年11月19日，聂元梓与孙蓬一等人秉承江青、王力旨意，到上海煽动造反派批判曹荻秋、杨西光等，并把常溪萍拉到会场批斗。在上海期间与张春桥密谈，提出打倒曹荻秋，揭发陈丕显。其后与华东师大联合掀起批判常溪萍的高潮，并和王洪文勾结，造上海市委的反。12月27日孙蓬一带领北大、华东师大联合兵团进驻上海市委，炮制了《刘

陈、曹六大罪状》的材料，四处张贴散发，诬陷陈、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市委工作陷于瘫痪。聂、孙在上海攻击诬陷常溪萍后，当地造反派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折磨常溪萍，常被迫害致死；他们还迫害常的妻子陈波浪，致使其终身残疾，还把常在抗战时期的警卫员班耀山迫害致死，这一系列惨剧，都是在聂、孙和张春桥的煽动下造成的。²

3、 打击排挤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等昔日战友

孔繁、杨克明、郭罗基都是北大哲学系的教师，也是聂元梓和孙蓬一社教运动时期的“战友”，杨克明还是第一张大字报的起草者，曾和聂元梓一起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工作组撤出北大后，孔繁曾任校文革第一副主任，杨克明曾任校文革委员和《新北大》主编。然而由于他们和聂元梓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对聂的一些做法提出意见，便被聂元梓操纵的校文革常委会赶出校文革，而以紧跟聂元梓的孙蓬一取代孔繁成为校文革的第一副主任。1967年3月3日，郭罗基贴出大字报《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给

¹ 详见戴为伟整理的《郑仲兵口述——北大文革片段》，载《记忆》第120期（2014年10月31日，北京大学文革专辑），

² 何洛、孟金：《〈聂元梓回忆录〉指误》，《百年潮》，2011年第2期。

聂元梓提出意见，又被聂元梓操纵的校文革打成“投机分子”，被说成“矛头指向红色政



权”“砍倒毛主席树立的红旗”，并清算他曾经给李讷打四分的

“罪行”。1967年8月后，孔繁、杨克明和郭罗基三人先后参加了聂元梓的对立面组织《井冈山兵团》，这一举动更惹恼了聂元梓和孙蓬一，校园的大喇叭里整日喊叫“揪出孔、杨、周、牛、侯”。

(1967年2月14日《新北大》第一

版上发表的批判孔繁、杨克明的文章。)

4、 残酷镇压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和学生

开始，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和学生，以及杨炳章、樊立勤、《共产青年学会》等，都被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残酷镇压，有的送到监狱关押（如杨炳章、共产青年学会的何维凌、胡定国）、有的被抓起来刑讯逼供致残（如樊立勤）、有的被批斗后含恨自杀（如中文系学生沈达力），有的在校刊上点名批判，在系里和班级批斗，严重地摧残了他们的身心，如数学力学系学生杨作森，被批斗后身体状况恶化，毕业后不久就去世了。

5、 残酷迫害北大干部、教师

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掌握北大大权后，先后建立多个劳改大院（也称牛棚），把北大几百名干部、教师集中进行劳改。关于牛棚中干部教师遭受的非人待遇，季羨林和郝斌先生在他们的回忆录《牛棚杂记》和《流水何曾洗是非》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里不再赘述。聂、孙等人对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是毫不手软，他们把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打

¹ 详见郭罗基：《我的学生李讷——江青之女》<http://zhenhua.163.com/14/0414/19/9PQIPQ1Q0004650U.html>

成“美国特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对周进行抄家；把党委第一副书记、副校长戈华打成“走资派”，从山东老家把戈华抓回进行批斗；把国际政治系总支书记、老干部张侠打成“假党员”，批斗、抄家，关进黑帮大院；把季羨林、侯仁之、周一良等著名学者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共老手”，把历史系多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残酷迫害哲学系教师颜品忠夫妇等。在聂、孙掌权期间北大非正常死亡24人，其中干部教师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如下：

董怀允，数学力学系讲师，1966年7月28日自缢

吴兴华，西语系教授，1966年8月3日劳改时被逼喝污水中毒当晚死亡

俞大綱，西语系教授，1966年8月25日服毒

程贤策，中文系总支书记，1966年9月2日服毒

沈乃璋，哲学系教授，1966年10月6日服毒

向达，历史系教授，1966年11月20日在劳改中不准治疗尿毒症死亡

程远，西语系打字员，1968年1月9日自缢

蒙复地，西语系讲师，1968年3月27日自缢

李原，历史系教员，1968年4月21日被殴打重伤后缢死

卢锡锬，化学系副教授，1968年6月24日服敌敌畏加自缢

林芳，化学系职员（卢锡锬之妻），1968年7月16日投湖。¹

6、发动武斗，围困镇压对立面组织和群众

1968年3月29日凌晨，聂元梓、孙蓬一策划指使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进入31楼，强行驱赶住在其中的井冈山兵团化学系的成员，挑起了武斗；4月26日，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又强行进攻36楼，造成双方多名人员受伤。其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采取断水、断电、断粮等方式，将几百名井冈山成员围困在几个楼中，并四处抓捕回家或在校外躲避的井冈山骨干，抓住后毒打逼供。这期间，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残忍地杀死了地院附中学生温家驹、

¹ 参考王友琴：63名受难者和北大文革，《北京大学纪事》。

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地质地理系学生刘玮3名无辜群众。直到7月28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对聂元梓、蒯大富严厉批评，才制止了武斗。

二、孙蓬一对自己的严重错误有一定的认识

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结束了聂、孙校文革的统治。军宣队在经过长期调查取证后，把聂、孙的错误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给北大校文革作出了“派文革，逼供信文革、武斗文革”的结论。¹

应该说，孙蓬一对自己在文革两年多中犯的严重错误有一定认识。在他1969年下半年的检查中，写到了对孔繁、杨克明问题，“井”“红”问题处理上的错误，写到了整风问题上校文革的错误，对待不同意见群众组织的错误，并写到了武斗中自己一派的责任：

“三月廿八日，如果我们顾全大局不去攻占三十一楼，北大这场大规模武斗是不至于发生的。4.26武斗的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也正是我这种错误指导思想所造成的恶果，我负有直接责任。是我从一派利益出发，图报复，不顾大局，决定去夺36楼的。结果使阶级弟兄互相残杀，许多同志无辜地流血受伤！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殷文杰同志的被刺死！4.27殷文杰同志的死和我的4.26的错误有密切关系。正因为我的错误决定，造成双方很多人受伤，当时，公社方面伤的较多，这就更使报复的情绪增加，导致了这样一起惨痛事件的发生，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直接犯下这一错误的同志，当然应牢记这一血的教训，不过，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刘伟同志的被打死，我也是负有责任的。我请求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本来应该使自己清醒起来，可是，资产阶级派性已使自己的头脑达到麻木不仁的地步。4.26以后，我们进而又把井冈山兵团围困起来，使许多在圈外的同

¹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4页。

志没有地方住，财产受到很大损失；被围在楼内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围在楼里见不了阳光，还给人家断粮断电，甚至企图断水，所受的摧残则更严重。而我当时，从资产阶级派性出发，还把这种局面看成是我们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被围在楼里的是些什么人呢？今天就更清楚了，是我们的革命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是自己的阶级弟兄，我的所谓大好形势，恰恰是建立在阶级弟兄的痛苦的基础上，今天想起来，确实感到是莫大的耻辱！我对不起井冈山兵团的广大革命同志，对不起自己的阶级弟兄，请这些同志对我的错误进行严厉的批判！”¹

由此可见，孙蓬一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制造武斗，围困井冈山和造成殷文杰、刘玮死亡的事情是承认的，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这远比聂元梓在其回忆录中躲闪、否认、推诿的态度要诚实得多。但是对于地院附中温家驹的惨死，孙蓬一却没有检查自己的责任，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温家驹是被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抓到生物小楼低温试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的。温死后，孙蓬一布置假调查，说温家驹“是政治小偷，是群众打的”，“你们不要怕，由校文革顶着”。²

笔者在2014年秋天访问杨克明先生时，杨先生亲口对我说：孙蓬一在被释放后，来到他家，在客厅里，跪在地板上，给杨克明道歉，承认在文革中对待杨克明和其他教师的态度和做法是错误的，请求杨克明原谅。杨克明看到他生活困难，拿出一些钱并联系哲学系原来参加井冈山的部分教师给他捐款，帮助他解决当前的困境。应该说孙蓬一向杨克明道歉的态度是真诚的，杨克明等老师对孙蓬一的态度也是值得赞许的。

三、孙蓬一不是“5·16分子”

1970年11月至1973年3月，北大开展了清查516集团的运动，甚至把已经毕业的学生抓

¹ 《记忆》第139期。

² 《北京大学纪事》787页。

回学校进行审查。《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记载：1971年6月9日，清查办《情况反映》：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聂（元梓）线隔离审查对象共10人，牛线（井冈山牛辉林）隔离审查共7人。1971年6月18日，校党委常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汇报，说前段全校审查52人，其中隔离审查25人（总校20人，江西分校5人）；12月25日，校党委常委、校革委会常委举行扩大会议，通报：“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工作，至今仍有专案审查对象117人。1972年5月31日，校党委常委开会，五一六清查办公室汇报说：可定“五一六”主犯2人，从犯9人，现行反革命1人，打死人凶手5人，受蒙蔽的80人，经审查排除的16人，还有36人未查清；6月26日，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北大（在校文革时期）的重大反革命事件有：“围困中南海”、“午门抗缅大会”、“利用0007密令调查整周总理黑材料”、“反军乱军”、“组织人员到国务院各部调查（根据陈伯达的指令）”等，这些都是“五一六”案犯的罪行，聂元梓、孙蓬一是这些事件的主犯，还有从犯多人。

1972年10月18日，校党委常委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时不戴帽子、交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1973年3月1日，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会议决定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批斗。会上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基本结束。

北大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当时全国一样制造了一场冤假错案，给清查对象强加了莫须有的罪名。那些所谓的“五一六”分子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所以，清查“五一六”运动应该彻底否定，聂元梓、孙蓬一虽然在文革中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甚至罪行，但他们并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

四、 孙蓬一也不是反“四人帮”的英雄

章铎在文章里，一再强调孙蓬一反对“四人帮”，企图把孙打扮成反“四人帮”的英

雄。事实果真如此吗？

章文和胡宗式的一些文章里，建立了一条这样的逻辑：聂、孙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反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这是不能成立的。

潘梓年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杰出的新闻斗士。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钦点为第一任社长，因此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推动了全国的哲学研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残酷迫害，1972年4月10日在秦城监狱病逝，终年79岁。1982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大会，肯定了他一生的功绩。¹

聂、孙给潘梓年加的罪名是“叛徒”，可是后来查明的事实是，潘梓年不是叛徒，而是在狱中对敌人作了顽强斗争，并写出了哲学和逻辑学著作。所以反潘是反错了，而且潘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怎么能说反潘就是反“四人帮”呢？

吴传启文革前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1966年5月23日和林聿时贴出批判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占领了学部造反舞台的制高点，8月27日成立了第一个造反派组织“学部红卫兵联队”。1967年8月后，吴传启等人被关入监狱，1980年代吴传启、林聿时被从监狱放出来，“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使他们在北京平静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²

1966年底-1967年初聂元梓、孙蓬一等派人到学部夺权，和反对吴传启的一派组织“红卫兵总队”联合，反对吴传启和潘梓年等，本身就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这在文革中是很常见的。不能说后来吴被关押就证明聂孙是正确的，也不能说吴和关锋熟悉就说反吴就是反关锋，更不能说关锋曾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关锋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对“四人帮”。文革中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今天有的人还在台上指手画脚，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后天放出来又重新工作。何况聂、孙等人跑到别的单位插手人家的文革活动，本身就是错

¹ 新闻研究资料，1993年第2期。

² 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2011年08月24日，人民网-历史学家茶座。

误的，反对潘、吴没有什么正当理由。

至于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在北大全校大会上炮打谢富治，称谢是“摘桃派”，也不过是认为聂元梓是第一造反派领袖，理应成为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不想被谢富治抢走了北京市一把手的交椅，又认为谢富治支持地派，和自己作对，情急之下口无遮拦，才喊出了“炮打谢富治”的口号。后来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的批评下，赶快做了检讨，后来又一再为此检讨。所以说孙是反谢富治的英雄，反谢就是反“四人帮”，也是说不过去的。当然，把反对谢富治当成孙蓬一的罪状之一，也是不公平的。

五、对孙蓬一问题的思考

孙蓬一出身贫苦，从小参军，到过朝鲜战场，性格直爽，心直口快，对毛泽东无限热爱，如果没有文化革命，他也许是个好干部、好教师。但在文革中，孙蓬一认为毛泽东支持的聂元梓是正确的，一直紧密追随聂元梓，干了许多坏事，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如果说聂元梓是文革发动者的一个工具，那孙蓬一就是工具的工具。孙蓬一文革后受到刑罚，出狱后神经出现问题，1996年去世时只有65岁（而犯下更严重罪行的聂元梓却至今健在，已经94岁）。孙蓬一从文革中的闹剧人物变成了文革后的悲剧人物，如果他至死都没有醒悟，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

文革这个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来的魔鬼扭曲了许多人的人性和良知，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例如清华大学一些学生，在武斗中对不同派别的同学下手，对工人下手，打死打伤同学和工人；又如一位北大学生，文革后被分配回山西老家，后来成了中学特级教师，受到学生和同事的好评，其实他曾经是文革中刺杀殷文杰的凶手之一。这些人并非生下来的就穷凶极恶，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的驱使下，认为对方就是国民党的余孽，就是坏人，而自己是紧跟领袖干革命。同样，孙蓬一本人的个人品质也许不坏，当时公社派的许多群众也很拥护他，正像章铎文章中说的：“他直爽、热情、有胆有识，我和好多同学都喜欢他。”

但是我们看问题应该放到文革这个大的政治环境来看，个人品质的好坏并不能决定在政治斗争中的正确与错误，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孙蓬一身上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愚忠色彩，对文革发动者愚忠，对聂元梓愚忠，这种严重的愚忠思想害了他，使他不明是非，紧跟文革发动者和聂元梓，犯下了许多严重错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希望章铎和与她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从孙蓬一身上总结历史的教训，分析他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从而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而不能仅从个人感情出发，为他的错误辩护甚至翻案，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也是徒劳的。■

【评论】

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

胡宗式

《北京大学纪事》是为北大百年校庆（1998年）而出版的官方出版物，并于2008年再版。对于中国来说，文革无疑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有着多方力量参与的极为复杂的政治斗争。处于文革漩涡中的北大，更是多种矛盾交叉，多种力量争斗的地方。现在有些人，无视历史的复杂性，摒弃公正立场，以其固有的偏见与派性，选择性地遗忘，选择性地记史，把北大复杂的文革历程歪曲为仅仅是反聂和保聂之争，反聂即是有理，反聂即是正确。《北京大学纪事》（文革部分）就是这样一种选择性记史的代表作。

本文以1967年发生在北大的三件大事为例，看一看《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如何歪曲历史真相，如何选择性记事的。这三件大事是：

- 一、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 二、聂元梓、孙蓬一揭发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并发起了反吴传启的行动；

三、由孙蓬一 1967 年 4 月 13 日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

一、关于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态度和立场

“二月逆流”事件的本质，是几位老师和副总理，在不同的会议上发表了对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满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和批评。刚刚被毛泽东批评过的中央文革，利用这个机会，给几位老师和副总理扣上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帽子，并通过暗中操作，在社会上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行动。他们还把矛头指向了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了“二月抗争”，许多文章讲述了老师和副总理们抗争的故事，但很少有人提到在反“二月逆流”浪潮袭来时下层群众的表现。实际上，当时的许多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虽然对上层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出于正义和良心，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抵制了中央文革的倒行逆施，对老师和副总理们表示了同情。他们的表现，体现了人心向背，体现了“公道自在人心”的古训，也是值得称道的。

1967 年 3 月 7 日，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北京公社、钢铁学院 919、民族学院东方红这 6 个群众组织，突然贴出了大量标语：“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揪出谭震林的后台！”等等，声势非常浩大。其他群众组织在惊诧之余，也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谭震林是主管农业口的副总理，但这次提出打倒谭震林的 6 个组织，没有一个是农业口的，而且，给谭震林扣上“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样的大帽子，却没有任何证据，提出的事实都是旧事，如指责谭震林在农口支持保守派夺权，等等。6 个组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另外 4 个高校组织，当时尚不是红代会成员。因此，这种情况非常令人不解，也很不正常。多数大学的群众组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坚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种口号，无不晕头转向。一个多月前，大概是 1 月份，“农大东方红”因炮打谭震林而受到戚本禹的批评，为此曾贴过“向谭震林同志请罪！”的大标语。北师大等单位掀起了“打倒谭震林”的浪潮后，“农大东方红”一个跑动态的成员，来到北

大动态组说：“师大真不够意思。我们到他们那里了解情况。他们说你们先表态，然后给材料。”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使刚刚成立的新北大公社总部十分震惊。动态组全力调查，再三打听，最后只获得一条信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详情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毛泽东说了很重的话。另外，我们还了解到，这次浪潮的矛头所向，下一步还有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副总理。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同时把矛头指向好几个副总理，把副总理都打倒，最后不就反到周总理头上了吗？这使我们深感忧虑，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警觉。

我们把了解到的情况，都及时反映给了聂元梓和公社总部。在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发动反谭震林行动之后的最初几天里，部分校文革委员和公社总部委员经常在“动态报”开会，研究形势的发展。当时聂元梓的态度是：你们再详细调查，总部先不表态，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反击。

我们对农业口的文革情况作了初步了解，发现农业口各单位情况非常复杂，两派斗争很激烈，但从1月份以来，并没有发生可以推翻戚本禹1月讲话、打倒谭震林的新情况。农业口的几个知名人物，如左叶等人，都不知道这一次发生了什么事。公社总部曾在大饭厅开了个群众大会，我介绍了当时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同学们从这次情况介绍得出了一个印象：公社总部是保谭震林的。部分群众有意见，责问公社总部为什么不赶紧表态打倒谭震林。群众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使公社总部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压力。

我们知道谭厚兰有后台，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正规渠道的指示，怎么能根据一点点小道消息，凭分析和推测，就动员北大群众跟着他们走呢？公社总部还在了解情况，商议对策，但有两个战斗团在3月9日先行表态了，贴出了炮轰谭震林的标语。

3月11日晚，戚本禹提出收回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戚本禹是中央文革成员，收回先前讲过的话，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这样，当时的压力就非常大了，整个气氛，逼着每个群众组织都非表态不可。在此情况下，公社总部于3月12日发表了“炮轰谭震林！”

的声明。

3月13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出现的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问题。会上，红代会作战部长和农大代表先后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份及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当农大代表快讲完时，谭厚兰来到会场。代表们请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对于韩爱晶的意见，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有人提议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第二天，红代会组织了十万人反谭震林的大游行。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负责人之一聂树人，对这次会议也有记述：

3月13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开会，研究部署反击“二月逆流”。……我作为宣传组组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慎重和稳妥，大家建议聂元梓给中央文革打个电话，将红代会准备行动的想法告诉上面，以观高层的态度和战略部署。电话在小会议室的套间。聂元梓进去时把门关上了，说的什么，外面人听不见。几分钟后，她出来了，对大家说：“我把会议的决定告诉给办事组，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1967年3月15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红三号）还以《坚决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首都红代会昨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为正副题，报导了“红代会”这个半官方组织3月14日大游行的情况。¹

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第133--135页。

据新近了解到的情况，聂元梓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时，中央文革办事组有一句回话：“你才知道啊？！”这明显是一种斥责。聂元梓在红代会核心组的会上没有传达这一句话，回到北大也没有公开说。但这一信息，公社总部是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加上红代会也做出了决定，公社总部不得不于3月14日（也许是3月13日晚）发表了一个“打倒谭震林”的声明。公社总部之谨慎、被动与无奈，可见一斑。

新北大公社发表“打倒谭震林”的声明，乃时势使然，谭震林到底说了什么“犯上”的话，仍一无所知。我们认为，像谭震林这样资历和级别的干部，即便在会上说了什么，也不能因为几句话就将他打倒。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谭震林真的应该打倒，所以，公社动态组仍接待过农口的左叶、谢文景、李星等人，甚至江一真来访。新北大公社总部个别勤务员也见过他们，不过他们可能并不清楚我方人员的身份，所到的地方也仅仅是公社动态组。这些联系后来不仅受到反对派的大肆攻击，大概也受到过上面的调查，但与聂元梓、孙蓬一等确实没有关系。

在对待“二月逆流”问题上，北京市分成了两大派：“打倒派”和“炮轰派”。聂树人在书中写道：

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成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公开的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但是，实际情况，既不炮轰，更不打倒。“新北大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引起江一真、左叶等人的注意。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他的地位仅次于谭震林。江一真1967年4月到北大“串联”。这件事，被当时的对立派说成“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¹

¹ 聂树人：《北京天、地两派的争斗》，第135页。

在掀起“打倒谭震林”浪潮的同时，一些单位也开始了对另外几位副总理的攻击。例如石油学院“北京公社”、师大“井冈山”和吴传启控制的“学部联队”，从3月12日起，把矛头指向了余秋里，成立了“揪余秋里联络站”，要打倒余秋里。他们甚至将矛头指向周总理。周总理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第二天师大等单位就开广播车到计委门前狂呼：“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混蛋逻辑”。民族研究所的洪涛到地质学院说：“谭震林、余秋里是二月逆流的哼哈二将。”

新北大公社总部经过调查和慎重研究，认为当时提出来的要打倒余秋里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北大同石油系统从无关系，周恩来又多次讲过保余秋里的话，如“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等等，因此，有半个月之久，新北大公社对余秋里问题根本没有表态。新北大公社的这一立场，聂、孙曾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讨论，予以支持。直到3月27日，新北大公社才以支持红代会3月25日声明的形式表态“炮轰余秋里”，但新北大公社的声明同时强调“我们必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警惕阶级敌人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周总理的逆流。我们重申：周总理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就坚决镇压！”（笔者手头没有红代会3月25日的声明，暂无从核查，但该声明显然有“炮轰余秋里”的内容。）

3月13日，洪涛和统战部的刘郅跳出来贴了李富春的大字报，题为“就统战民委系统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与李富春同志大辩论”，其内容是批判李富春同志关于统战系统的一个讲话。同时在经委，一些人通过反薛暮桥来反李富春，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洪、刘两人是1月15日抢档案事件的主犯，北大早有看法。李富春不仅是副总理，还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当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洪、刘的大字报是个人署名，不代表群众组织，这下让北大逮了个正着，立即予以反击。北大《动态报》67.3.17期第4版有如下内容：

周总理、李富春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

洪涛、刘郅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罪责难逃！

统战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负责人洪涛、刘郅于3月13日贴出题为“就中央统战部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的大字报，肆意攻击李富春同志，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必须给以有力的回击。

又讯：今日，新北大公社部分战斗队上街贴大标语：“周总理李富春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不许洪涛、刘郅攻击李富春同志！”

3月17日，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必须严格区分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公社命令，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要保，一保到底！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新北大公社社员一律不许参加炮打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的反动逆流，违令者，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¹

中央文革将北大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表现视同叛逆，时不时拿“二月逆流”说事，用这根大棒打压北大。例如，关锋在1967年5月27日警告聂元梓说：“你们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²新北大公社总部因为不了解事情来由，对于反谭震林的事固然步履维艰，疑虑重重，但还没有愚蠢到说“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这样的话，新北大公社从内心里固然是保余秋里的，但从未这样公开宣示过。不过，关锋这种手段一点也不新鲜。先无中生有造谣栽赃，再施以威胁恫吓，这是关锋一贯的伎俩。关锋用这种手段对北大进行威胁和打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一次，尽管关锋说得气壮如牛，但他政治生命的倒计时已经开始，再过三个月就要垮台了，爬不起来的恰恰是他自己，“奉陪”

¹ 转引自新北大公社“愚公”：《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中的严正立场，载《新北大》1967年10月22日。

²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第220页

云云，只能成为笑柄。

对于这样重大事件的叙述，《北京大学纪事》很是节约笔墨：

（1967年）

3月14日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3月18日 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批准。¹

上述第一条只是新北大公社声明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对于新北大公社在这一浪潮中的艰难处境和对反“二月逆流”的被动消极乃至部分抵制的态度，对新北大公社保几位副总理，实际上是坚决保卫周总理的严正立场，《北京大学纪事》只字不提，这就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

第二条就太离奇了，首先时间不对，把13日写成了18日，至于“得到戚本禹批准”云云，完全是编者的臆造。聂元梓明明是给中央文革办事组打电话请示，《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非要说是向戚本禹请示，无非就是要把聂元梓和戚本禹联系起来。编者为何不把关锋威胁聂元梓的那几句话写上呢？还有，北大井冈山后来大肆攻击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勾结谭震林”等等，为什么不写上呢？新北大公社一再声明保卫周总理，编者为什么不写上呢？

新北大公社总部有一个艰难的认识过程，他们固然欠缺能力，但在这一场极其复杂的政治风暴里，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坚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他们不仅一再声明保卫周总理，还在实际行动中对那股企图打倒几位副总理并进而攻击周总理的势力进行了抵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大的许多师生，都会因为支持新北大公社总部在反“二月逆流”浪潮中的

¹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3页。

态度和立场而感受到很大的精神压力。特别是在1968年秋天，工、军宣传队传达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精神之后，虽然新北大公社已经解散，但人们依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样写道：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这个公报，不仅严厉批判了“二月逆流”，还把1968年初，在高校学习班里许多群众组织坚持批判王、关、戚和批判谢富治的做法，说成是“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1971年初，我被押回北大参加清查5.16运动时，“二月逆流”和高校学习班等问题，都是被要求以“罪行”来交待的。

这种压力直到“9.13事件”之后才得以部分解除。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说：“你们再不要讲他（指叶剑英----引者）‘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¹毛泽东亲自为“二月逆流”平了反，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了，但迟群之流是一伙蛮不讲理的“常有理”，他们又把“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扣到我们头上。迟群一伙公开宣称：不管是炮轰，还是打倒，都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到了1998年，《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了，不能再指责新北大公社“勾结谭震林”了。但是，“断章取义”、“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于是，在这些“永远有理”的编者的笔下，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又有了“反二月逆流”的罪名。

历史证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这一次把中央上层小范围内发生的、并正在解决中的事情先扩散到一部分群众当中，制造一种暴风雨般严重、肃杀的气氛，再滥用自己的权威，

¹ 张化、苏采青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第647页。

误导、利用广大群众的做法，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而许多北大师生，继“一月夺权”之后，正是从这一场政治风暴中进一步审视中央文革，对中央文革有了更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将在4月份转化成为向关锋、王力及吴传启一伙开战的行动。历史还证明，从这一场政治风暴中进一步认识了中央文革某些人真实面目的群众组织和个人，绝不止北大一家。这一结果，大概是掀起反“二月逆流”风暴的幕后推手所意想不到的。民心不可侮，此其一例。

“反二月逆流”的气候和土壤，还滋生了以张建旗为首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样的毒草。另外，这股“反二月逆流”的浪潮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催生了“全国全面内战”的严重局面。而随着这股由王、关、戚们掀起来的浪潮，他们自己也快速地滑入了反军、乱军的罪恶深渊。换言之，王、关、戚们之所以坠入反军、乱军泥潭，正是“反二月逆流”的必然发展。事情的恶性发展让毛泽东也无法容忍，终于作出了“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的决断。¹

二、聂元梓、孙蓬一揭发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并发起了反吴传启的行动

在“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的过程中，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逐渐看到了关锋、王力、吴传启等人结党营私的丑恶勾当。1967年4月8日发生民族宫事件后，聂元梓、孙蓬一感到有必要向上反映关锋、王力的问题。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江青当面陈述了对关、王一伙的意见。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多年后，笔者才从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获知这件事情的经过，老孙写道：

高教部事件后，北大从上到下，都在胸中沉积着一股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闷气。“5·16”们则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视我们为软弱可欺，冲突不断发生。我们总是受气，真是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了。不公开起来与王、关、戚对着干，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14页。

简直要把人气疯、气死了。这伙以“左派”自命的家伙，其篡党祸国的用心，若再容忍下去，则我们是无颜再以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居了。四月八日民族宫事件后，我就主张公开反击、指出问题实质。当时李清昆等人建议为稳妥起见，还是去找江青当面汇报一下，以取得支持。聂同意了。九日写了一封求见信，十日下午她与我就去了钓鱼台。那天正好是清华斗王光美。

我们去后，在场的有江青、陈伯达、戚本禹。我记得是16号楼（文革办事人员所在的楼）的一层会议室里，江先问了清华斗王光美的情况，然后问我们是否找王力、关锋来一起听听。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拒绝。戚本禹则以早有先见之明似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不会同意的。”为什么我们没有拒绝戚本禹呢？因为当时还认为他与王力、关锋不同，根据是：（1）高教部事件他未给我打电话；（2）放郑仲兵，是戚根据郑母的请求信下的令；（3）他当时反对朱成昭。

我和聂坐在长形桌子的一面，对面是他们三人：中间是江青，右边是陈伯达，左边是戚本禹。我们向他们谈了高教部事件，谈了林杰、周景芳、潘梓年、吴传启及其北京市里那一伙，包括高教部的卢正义、徐非光。指出他们这一伙人许多人都有历史问题。我则公开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谈话间，江青倒没有怎么反驳我们，给人的印象她是在耐心的听我们的汇报，而唯有戚本禹不断地为王、关辩护。当谈到潘梓年、吴传启时，江青说：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不和他们联系吗？（对戚）你把吴传启的档案拿来给我看看。戚本禹答应明天就给她。当说到周景芳时，我说他去市委，是说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去的，以中央文革代表自居，地院的广播中，更说周景芳是中央文革的新成员。江青指出：他是什么中央文革代表、成员？！他连中央文革来都没有来过！戚本禹此时就插话说：可以说是中央文革委托的。陈伯达则说：这样恐怕不好吧，不能这样说。陈的语气是很平和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下子却激怒了戚本禹，当着我们的面就大发其火，把手一拍：这没有什么！我负责！这是经过了主席的么！戚本禹还想发作下去，江则

如对三孙子那样，爱抚地拍了一下戚的手臂：嗯……，这才制止了戚。弄得陈伯达十分难堪，羞辱之色，从脖子到脸一下子都棕红了。陈最后语调平和但却充满委屈，不解地说：我从来还没有看见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呢。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使我从此认清了戚本禹在江青那里，确是一个宠儿。戚本禹与王力、关锋是一伙的。所以以后，当了解到戚想控制北京市时，我是深信不疑的。派周景芳的（事），也显然是戚本禹同王力、关锋一起干的。而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他虽是组长，但地位还没有戚本禹来得显赫，戚对他是毫不敬重的。

我说到王、关包庇那一伙，是搞结党营私时，江青说：我们没有那样的感觉，只是感到关锋的性子拗一些。接见我们将结束时，姚文元进来了，我记得随后周总理也来了。於是谈话就结束了。江青送我们到16号楼的门口，还告诉我们，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特别不要损害了王、关的威信。

江青大概明白，此次聂、孙进言，完全是出于好意，所以她没有像对待陶铸那样对待聂、孙。江青能够听聂、孙把意见讲完，应该说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她也没有再说“吴传启是左派”一类的话，反而表现出一种和吴传启拉开距离的态度。1966年江青曾经因为吴传启和卢正义的问题同陶铸发生过激烈的冲突，知道有关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这次江青向戚本禹提出来要看吴传启的档案，显然是想表明她原先不了解吴传启。应该说，江青这一次对聂、孙还是很客气的，聂、孙走的时候，江青还送他们到楼门口。

但是，直性子的炮筒子孙蓬一，在前一天地质学院的人打上门来的形势下，4月12日在大饭厅的大会上讲话时，将江青“今天谈的事，出去不要讲”的关照忘在了脑后，公开向吴传启一伙发起了宣战。讲话登在4月13日《新北大》报上。这里节选部分内容：

……所以说，这一场斗争不是简单的、所谓左派内部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鼓掌）这一场斗争的最根本最根本的问题，也是和一切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一样，

就是围绕一个政权的问题。(对! 热烈的长时间的鼓掌)

……他们以攻击聂元梓为借口, 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要“新北大滚出红代会”, 要“聂元梓滚出红代会”, “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红代会的核心小组必须彻底改组”, 要换所谓“老三司”, 说“聂元梓凭什么当了红代会核心小组的组长”, “我们不信任你, 到底是谁保你的驾”, 要揪出聂元梓的后台。

目前的这场斗争, 既然意味着夺权, 意味着无产阶级江山握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 因此, 什么“委曲求全”呀, 什么“忍辱负重”呀, 让其统统见鬼去吧!(对! 长时间暴风雨般的掌声, 呼口号) 在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面前, 我们只能当仁不让, 寸土不让, 寸权必夺, 寸土必争!(对!) 因为我们这样做, 不是为了几个人, 也不是为了我们新北大的小团体, 是为了整个阶级, 是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 长时间热烈鼓掌)

目前, 从北京看,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 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一方面整个的形势是大好的, 而且越来越好; 而另一方面存在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 这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 过去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爪牙们, 他们也企图翻案。像中宣部、统战部就有那么一股势力, 那么一帮黑帮爪牙, 他们企图翻案, 他们企图搞第二次反攻倒算。同志们, 我们能答应他们吗?(不能!) 也有另外一种人, 他们为了达到他们垄断、独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这一目的, 便不择手段, 只要是可以被他们利用、为他们服务的, 只要是支持他们的, 他们不管这些人是什么派, 就一律给他们送上一个最美丽的桂冠: “革命造反派”。而这样一种力量, 采取一种非常不正当的手段, 采取拉一伙, 打一伙, 拉拉扯扯, 勾勾搭搭, 招摇撞骗, 把手伸得很长很长, 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 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 当他们跟别人辩论, 他们提不出充足证据的时候, 便拿出所谓的王牌, 说: 某某支持我们。不管什么人, 只要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他支持了你, 那么他也是错误的!(对!) 无产阶级革命者, 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对!) 我有必要再一次阐明我的观点: 在我看来, 这一股势力的代表, 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 而是一些机关, 是真正的摘桃派, 那是一些什么人? 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

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对！）中央统战部红色联络站。（对！）至于还有一些单位，他们人数虽然很多，但是，在我看来，那只不过充当了一个打手，充当了一个工具！

孙蓬一的讲话并没有点关锋的名字，但社会上大家都明白。孙蓬一的讲话在中央文革内部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至今不得而知。可以推测的是：关锋一定会非常震惊和愤怒，愤怒之余，一方面赶紧让吴传启、林聿时之流外出躲藏，另一方面会利用各种手段在北大内部制造混乱；江青会感到很被动，所以她后来说“聂元梓的那个助手不好”，但江青的地位摆在那里，别人是奈何不了她的，被动不到哪儿去，相反，到关、王垮台时，这还可以成为她的资本；至于戚本禹，不知道他有没有把吴传启的档案拿给江青看，但他自己肯定会对吴传启警惕起来，就在这个4月份，戚就在学部拉起了一派自己的力量，也开始反对吴传启。

孙蓬一的讲话，对于吴传启一伙来说，无疑是五雷轰顶，年龄大、历史不清白的，赶紧外出逃亡，年轻一点且历史清白的，如洪涛，则向北大发动全力反击。洪涛在北大的合作者，其代表人物就是牛辉林。

孙蓬一的4.12讲话可能非常鲁莽，策略上很不妥当，但许多北大师生由此认识到，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困惑和事件，根子究竟在哪里。孙蓬一的公开讲话，使矛盾的实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使任何暗中交易或妥协成为不可能。“出头的椽子先烂”，孙蓬一的讲话，得罪了許多人，尤其得罪了王、关、戚的后台。孙蓬一以后的种种噩运，实肇始于此。

孙蓬一的4.12讲话，以及4.13由孙蓬一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无疑震动了中央文革。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体出动，连康生都出马了，还有谢富治，一起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他们讲话的目的，是要消除孙蓬一这两次讲话的影响，是为了灭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讲话除了表示中央文革是一致的，以及批评孙蓬一关于“摘桃派”的说法之外，并没有人公开出面保那几个被孙蓬一点了名的人，大概他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没有人再说“吴传启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了。康生还给了聂元梓一封有关抓叛

徒的信，意图拉拢，使北大把注意力从反吴传启转移到抓叛徒上。但是，情况已经不同了，他们的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北大揭露吴传启一伙的决心，也没有能阻止北大揭露吴传启一伙真面目的行动。

从4月下旬起，北大“除隐患”战斗队公布了关于潘梓年的几批材料。就笔者记忆所及，先公布的是潘解放前发表的反共文章，最后是有关潘历史问题的材料。有人证明，1926年组织上曾通知潘梓年参加他们的小组生活，证明潘已是党员。但在1927年白色恐怖时期，他发表了不少吹捧蒋介石、骂共产党的文章，说明他在政治上已经叛党。1967年5月，报纸上正在批判刘少奇吹捧电影《武训传》时，北大收到了一封信，举报说潘梓年某某时候，在某某杂志上发表过吹捧武训的文章。到图书馆一查，果真如此。这也成为批判的材料。至于潘是否叛徒的问题，学部的“大批判指挥部”曾辗转托人到北大了解过相关材料，他们也认为“潘的叛徒问题是板上钉钉的铁案”，“就凭这些材料也可以打倒潘梓年。”¹（至于现在如何看待这些材料，是另外一回事了。）

“除隐患”战斗队还对吴传启的历史作了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调查吴传启更为困难。吴传启不仅拥有“左派”的桂冠，掌握着实力强大的“学部联队”，实际上还控制着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吴传启同关锋有着悠久密切的关系。因此，揭露吴传启的困难很大，风险也很大。吴传启的薄弱点是他解放前的复杂历史。因为历史问题，吴传启在50年代就受到过组织的审查。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部又揭发出来吴传启的历史问题。正因为吴传启历史上有问题，是国民党，陶铸才坚决拒绝了江青的要求，拒绝去学部宣布吴传启是“左派”，并为此同江青发生了直接的激烈冲突，江青为此大哭大闹，陶铸由此和江青彻底闹翻了。² 解放前吴传启长期在武汉供职，要调查他的历史必须去武汉档案馆查阅档案。正好，4月初的时候有一次首长接见，孙蓬一给周总理写了一个纸条，说我们了解到一些叛徒线索，是否可以调查？总理批示“可以调查”。有了总理批件的帮助，

¹孟祥才：《我所知道的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cq/article_2013111295161_2.html

²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53—455页。

“除隐患”战斗队的同志顺利地进入了已实行军管的武汉档案馆，查阅了许多档案，查到了许多吴传启的历史材料。他们调查回来，曾整理打印出一份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材料。“除隐患”战斗队1967年6月1日用大字报公布的材料，可能是这份材料的压缩版。但这两种材料，我自己未能找到。

北大反吴传启的行动也得到了社会上的支持。有人给北大寄来了一份吴传启自己写的自传材料，“除隐患”战斗队据此编写了一份《吴传启论吴传启》，准备开展论战的时候使用。1966年，学部曾就吴传启问题举行过长达六七天的辩论会，这次北大也准备打一阵笔仗的。但是，陈伯达的6.5讲话，扼杀了这场斗争，这份材料便没有公布。同年9月，吴传启被抓捕，这份材料便没有什么用处了。

潘梓年只是吴传启、林聿时推出来的一个“牌位”，并非要害，北大批潘的行动，并未遭到中央文革的阻击。北大揭发潘梓年的行动，进行了不到一个月，内容是贴了一些大字报，在校刊《新北大》上登过几篇文章。下一步当然是揭发吴传启了，可大字报还没有贴，中央文革就已经坐不住了，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出手了，要进行压制了，要把揭发吴传启的行动扼杀在摇篮里。

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求她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她谈话。聂元梓对这次谈话的记述如下：

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你是有水平的，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你合作，你要和我们站在一起。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听说你还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反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二月四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陈伯达在后面追上来，喊“不要生气呀，我们要合作哦！”¹

陈伯达等人对聂元梓的这次召见，在“扬子浪日记”中可以得到印证：

（1967年）8月21日

晚上，聂元梓讲了5月27日中央文革对自己的批评，共三点。第一点，中央首长说北京两派是聂挑起的，武斗要聂负责。聂辩解，戚本禹不让聂元梓辩解，说：不许你讲。聂说：那我只好到公社去劳动了。戚说：你就是到公社去，还是要找你。会上，聂提出了关锋一月夺权时的那个电话，关锋矢口否认。²

这是一次奇怪的召见。既然是“受江青委托”的谈话，总得谈出一个结果来，好向江青汇报。为什么关锋、戚本禹半中间就走开了呢？聂元梓也留下陈伯达，自己起身走了呢？显然，这是一次不欢而散的召见，陈伯达又拉又打，一方面以“合作”为诱饵，要聂元梓“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进行威胁，“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言外之意是：聂元梓要是不听话，下场就会和陶铸一样。关锋、戚本禹则是一如既往，用种种谣言来进行打压。聂元梓不肯屈从，双方谈崩了。如果真的是

¹ 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第220页。书中写28日，应为27日。

² 扬子浪：“扬子浪日记”《记忆》132期。

“受江青委托”，这样的谈话结果，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是怎么向江青交代的呢？江青又有何反应呢？或许，“受江青委托”一事，根本就不存在，就是陈伯达、关锋、戚本禹要把北大反吴传启的行动压下去。

就这次陈伯达等人的召见，在2015年4月29日的校友见面会上，笔者向当年“除隐患”的队长赵建文询问。赵说：老聂回来后对我说，上面有人不叫我们反吴传启。她没有说是谁不叫反。我问，我们怎么办？她说，按原来的计划。

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没有被权威吓倒，也没有为“合作”之类的利益所诱惑。6月1日，北大“除隐患”战斗队，以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了关于吴传启历史问题的第一批材料。仅仅这第一批材料，吴传启的后台们便坐不住了。他们愤怒了，软的不行，他们要来硬的了，内部谈话不行，他们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了。1967年6月3日陈伯达不点名批评了北大。6月5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点名批评聂元梓：“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将轰轰烈烈的反潘、吴运动打了下去。于是，北大进入了大分裂的时代。

(陈伯达 1967.6.5 讲话全文见 huzsh 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1dtzt.htmlhtml)

对于这样一起重大的事件，《北京大学纪事》是如何记载的呢？对于1967年4月12日孙蓬一的讲话，《北京大学纪事》作了歪曲：

4月12日 校文革召开万人大会，孙蓬一在会上发表讲话，说要“迎头痛击（地派）

资产阶级反动逆流”，“目前的这场斗争，意味着夺权，意味着江山落在什么人手里的问题”。“我们的口号只能是当仁不让，寸土不让，寸权必夺，寸土必争。”并指责对方（地派）是“真正的摘桃派”。¹

孙蓬一说的很明确：这一股势力的核心不在学校，而是一些机关，是真正的摘桃派，那是一些什么人？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北京大学纪事》编者明目张胆地将“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改成“地派”。事实上，在1967年4月，北京高校的分派，一般称为“北大派”、“师大派”，并没有地派的称谓。

关于北大反潘、吴的行动，《北京大学纪事》更不敢提及，因为这等于给聂元梓评功摆好。说它一字未提也有点冤枉，《北京大学纪事》通篇只有两个字：‘潘伯赞’、‘吴伯赞’中的“潘、吴”。

5月16日 校文革召开批斗翦伯赞大会。孙蓬一在会上说：“不管你是翦伯赞也罢，‘潘伯赞’、‘吴伯赞’也罢，如果不投降，就叫你们灭亡”。周扬、吴晗、廖沫沙等被揪上台陪斗。²

不知内情的人看到这一条，根本不可能知道‘潘伯赞’、‘吴伯赞’指的是潘梓年和吴传启。不过，《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说北大反潘、吴的行动是“分裂中央文革”，“为二月逆流翻案”和“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如果说聂元梓在1966年对中央文革还有点用处的话，那末，在1967年“一月夺权”的时候，聂元梓已经成了中央文革关锋、王力的绊脚石和眼中钉了。聂元梓在反“二月逆流”中的消极态度，更是受到中央文革的斥责，聂元梓坚持反吴传启，中央文革某些人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了。如果不是王、关、戚相继垮台，聂元梓大概在1967年就垮台了。如果聂元梓放弃揭发吴传启，如陈伯达所说的同中央文革“合作”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那样做，聂元梓就不成其为聂元梓，北大也不成其为北大了。

¹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74页

²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75页

顺便说一句，2014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笔者见到了原中央文革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先生。据王先生告，中央文革原先派驻北大的记者，对北大所持立场比较客观，但关锋对该记者非常不满，非要将其逐出中央文革不可。这种做法令王广宇先生也感到不解和为难，该记者不能派驻北大，可以派往别处嘛，何必将人家赶走。由此可见，关锋对北大有多么仇恨。北大后来驻过一个叫张超的中央文革记者，大概是关锋的亲信，不知后来怎么样了。将来的学者，倘能见到当年中央文革派驻北大的记者所写的报告，对研究一定大有益处。

三、由孙蓬一 1967年4月13日讲话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

谢富治本是一位老革命，《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常常提到的“陈、谢兵团”，“谢”就是谢富治，他有上将军衔，又是公安部长，文革中又率先揭发邓小平，所以，到1966年底，北大师生都是很尊敬他的。后来，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开始了解到一些校外的事情，特别是谢富治对1•15抢档案事件的处理，便对他有了看法。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室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公安部还印发了一个《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说刘郢、洪涛等人是左派，抓他们是犯法的。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人到公安部理论。洪涛等人又以冲击公安部和迫害左派为名，将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郑仲兵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收下，并将其关押了13天。

《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是

一篇奇文，于文革史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笔者抄录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派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罪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予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公安部某负责人”究竟是谁？显然，这就是谢富治，没有谢富治同意，是不可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名义印发这样的文件的。

这个文件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它有什么背景？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这显然是一个非

常荒唐的文件。刘郢是一个司局级官员，洪涛和另一个组织者曹振中都是中年人，并非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他们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其目的是什么？幕后推手又是谁？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绝不是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保护档案的。他们用大卡车抢了二十多箱（柜）档案，却有 15 个柜子无处存放，临时运到学部近代史所。该所张海鹏在其学术自传《学术人生——我的理想与追求》中提到这件事时写道：“只是 1.15 清晨，张德信打来电话，告民族所洪涛和红卫兵联队曹振中组织人抢了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柜，其中有 15 个柜子无处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随后有人开着卡车拉来 15 个铁柜。我让他们把 15 个铁柜分别放到几处屋檐下，没有同意放进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对铁柜加了封条。”这充分说明，“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中的“为了保护国家档案，……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云云，完全是谎言。抢了那么多的档案，甚至要用大卡车来拉，到了凌晨还不知道往哪儿存放，要临时找存放的地方，这是保护档案吗？有这样保护档案的吗？如果真是保护档案，为什么不拉到公安部或卫戍区去呢？显然，他们本来是想控制这些档案的，准备用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们太狂妄了，没有估计到会遭到那么多革命群众的抵制，几个头头还被抓了起来，事情还惊动了中央。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又怕阴谋暴露，于是，他们的后台出手了，不但要把洪涛、刘郢等人捞出来，还要借机封他们为“革命左派”，把革命群众保护档案、抓获洪涛、刘郢的行为说成是“非法绑架、斗争、拘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连公安部接待站的工作人员，都受到“违法乱纪”的指责，被责令“公开检讨”，还要“并于处理”。颠倒黑白，以至于此。

据张海鹏先生的回忆，参与 1.15 抢档案的，还有近代史所的曹振中——学部联队的一位骨干，这样，抢档案的不仅是民委统战系统的人了，学部联队也牵涉进去了。如洪涛、刘郢被拘押，曹振中也难逃干系，追查下去，必然会引向吴传启一伙，动摇学部联队的根本。刚刚利用打倒陶铸的事件打垮对手、站稳脚跟的学部联队，也会引起连锁反应，吴传启的后台，就无法利用他们呼风唤雨、兴风作浪了。所以，他们的后台出手了，通过谢富

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的堂而皇之的书面文件了。对于维护吴传启团伙、打击异己而言，“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有着关键的作用。

“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不仅荒唐，也非常愚蠢，它暴露了“公安部某负责人”和坏人勾结的真实面目。历史证明，谢富治和王、关、戚，其实是一伙的，“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就是他们公开勾结的宣言。后来在组建北京市革委会的时候，他们有进一步的勾结。吴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揭示，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重要岗位，都被“学部联队”的人甚至吴传启所把持。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

在“1.15事件”的问题上，北大不能接受“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并对谢富治有了看法。新北大公社再次对谢富治产生看法，是因为谢富治在处理“4.8民族宫事件”上明显偏袒一方的做法。

对于吴传启一伙来说，民族宫是一个重要的地方。1967年1月，北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联名向中央文革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他们开会策划这件事的地方，就是民族宫。¹民族宫和国家民委连在一起，是洪涛一伙重点控制的地方。刚刚组建一个多月的新北大公社总部不了解这些情况，不知道厉害，参与了民族宫和洪涛对立的一派批判“民族工作展览”的活动。新北大公社总部实际上并没有太看重这件事，鉴于合作方群众组织中工人比较多，写作力量薄弱，就派了几个中文系的同学去帮助写文章，完全没有想到会遭到地院东方红、民族学院东方红等单位的围攻和驱赶，会发生“4.8事件”。4月8日上午对立派以保守组织无权批判展览会为名，把我方工作人员赶出设在民族宫的展览馆。按照他们的借口，其目的已经达到。但他们仍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调集人马，准备更大的行动。在批判展览工

¹ 卜伟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1966--1968）——砸烂旧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第396页。

作室的北大人员，向总部告急。听说发生了矛盾，公社总部一把手代领一些人去解围，也不过去了五十来人。我方的人员包括北大、民族学院、民委、其他院校参加批判展览的工作人员，全被困在民委大院的一些房间里。我们代表前去谈判，聂元梓和蒯大富以红代会的名义，呼吁停止冲突的建议，吴德和戚本禹的秘书到现场，呼吁双方撤出，停止武斗。这一切都不奏效。对立派执意把事件搞大。面对训练有素的武斗队伍，没有防备、没有见过武斗场面的北大学生及其他单位的人员毫无抵抗能力，最后被地院等校的人一个个拖出民委大门外，驱赶到大马路上。

挑动武斗的其实就是洪涛一伙。关锋、王力垮台后，洪涛也被逮捕。新北大公社曾获准审讯洪涛等4人。洪涛交代，4月8日晚，他就在现场指挥。北大只派出了几个帮助写文章的学生，洪涛一伙就视作心腹大患，非除掉不可。所以，没有“4.8事件”，也会发生别的事件。

某些人决定利用4.8民族宫事件向北大发动直接的攻击。在他们的挑唆下，1967年4月11日晚饭后，来自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院校的6辆广播车闯入北大校园，他们高喊着“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口号，进行挑衅。他们的挑衅活动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半钟左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孙蓬一决定把他们赶出去。广播台按孙蓬一的指示向全校广播：为了明天批斗王光英的大会能够顺利进行，总部要求地院等校学生退出北大校园；北大学生行动起来，把那些无理取闹者赶出校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过了一些时候，同学反映6辆广播车，有5辆已经哑了，只剩一辆还在喊叫。当时孙蓬一和我在广播室，我说我去解决它。在汽车周围有3层人，我挤入人群，挤到喇叭下方，跳起来扯断了喇叭线，广播车便哑了。接下来，北大同学把广播车一辆一辆推出南校门。有文章说北大砸坏了广播车，这是夸大其词。充其量是揪断几根电线而已。广播车周围有好几层人在保护，砸得着吗？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聂元梓打电话

给我，说一些情况她不清楚，让我一起去。到了大会堂，聂元梓首先向会议的组织者说明多来一人，组织者同意我进去。下午开会，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你们两家不必发言。”会场上有人提问，质疑我的身份，谢富治问聂元梓，聂元梓答道：已经和会议的组织者说明了。会议开始后地质虽然没能发言，但是参与事件的其他五个学校都可以发言攻击北大。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我在聂元梓的身后，看到她流下了眼泪。这时会议室的大门开了，一下拥进来20多人，我认得其中一位女的，她是地质东方红动态组负责跑北大的。他们一看屋里有那么多人，就嚷着：“不是说单独接见我们吗？”说着就要往外走，会议组织者一拦，他们又都回来坐在后排，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经过这一折腾，会议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了。谢富治起身到边上的小房间，地质的人随后进去。过了一会儿他们过来，围着我们说：“谢副总理说了，找聂元梓来解决。”聂元梓起身到小房间去，我和孙蓬一到大会堂门口，一会儿聂元梓出来，地质的人围了上去。聂元梓问会议组织者：“会议还开不开？”答曰：“不开了。”我们便走下台阶，地质的人一直追到我们的汽车旁，骂些老保、挑起武斗之类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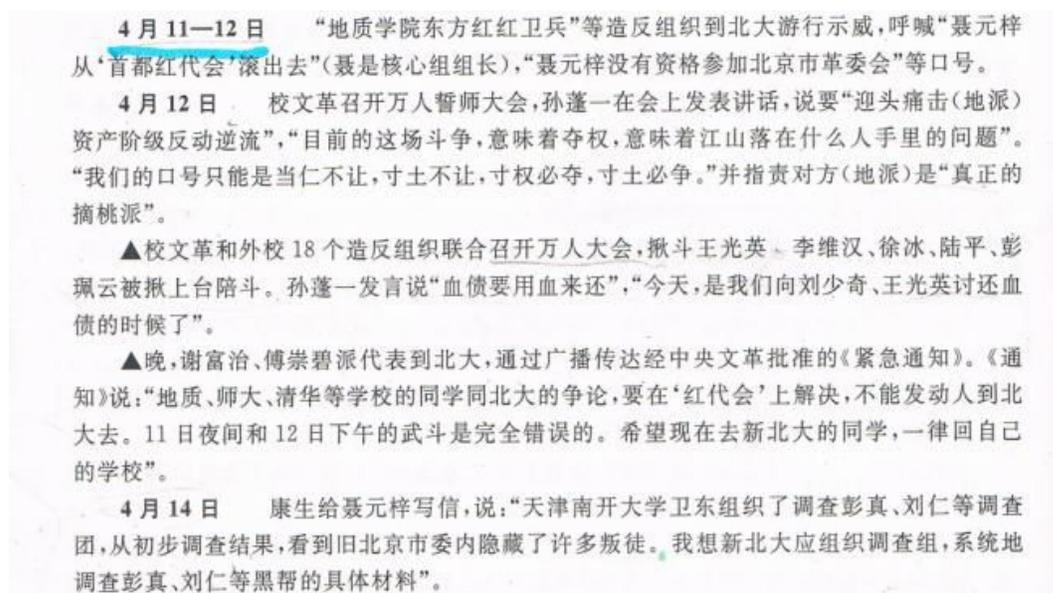
汽车开动后，孙蓬一问：“谢副总理怎么说的？”聂元梓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停了一会，孙蓬一说：“回去以后要把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对群众讲。”聂元梓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因为都很生气，一路无话。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到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大庆公社和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发表了讲话。听到动静，自发来了很多同学。会场气氛很是热烈。后来孙蓬一即席讲话。他讲了下午的接见和“1.15事件”等情况：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名义上说开的是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矛盾的会议，但会上不让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去的。是非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我们多去了一个人，谢富治便要问为什么多

了一个人，地质去了20多个人，谢什么话都没说，这公平吗？

在大会上，孙蓬一还讲了吴传启之类是真正的摘桃派以及和吴传启一伙斗争的性质。孙蓬一的讲话很有煽动力，全场情绪激昂。孙蓬一讲完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组织人去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这时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了这一行动。聂说，北京市革委会4月20日就要成立了，现在绝对不能反对谢副总理。于是，公部总部的人立即派人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聂元梓和李清昆亲自坐小车去追。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从此，聂元梓、孙蓬一的头上就戴上“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北京大学纪事》是如何记述炮打谢富治这件事的呢？读者不用费心去找了，在《北京大学纪事》主编的笔下，1967年4月13日这一天是不存在的。（见下图）



上图：《北京大学纪事》没有4月13日这一天

孙蓬一做了一件捅破天的事。第二天，也就是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和谢富治接见红代会各院校代表。会议上，批评地质学院的只有轻描淡写的寥寥几句：

江青：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

康生：昨晚谢副总理向我汇报了昨天的情况，准备解决问题。地院东方红没有遵守谢副总理的指示，出了26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批评北大的就很多了。针对4月10日聂元梓、孙蓬一说王力、关锋结党营私的事。各位的发言，对此都有表态。

江青：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一会儿就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姚文元：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

康生：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

陈伯达：把我和关锋同志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和王力、关锋、戚本禹同志一起工作的。不要在这里有什么小空子可以钻。要走大路，不要走小斜道。

对于孙蓬一在4月12日、13日两次大会讲的摘桃派问题，中央文革一致给予批判；

姚文元：……有人提出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

陈伯达：现在好像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的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现在我们北京是无产阶级的首都，在一些学校、机关、工厂出现了摘桃子的错误观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机关、学校，这个单位，如北大、清华，上上下下都万众一心吗？难道没有陆平吗？没有蒋南翔吗？没有黑帮吗？没有刘邓代理

人？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那样万众一心吗？

关于炮打谢富治，中央文革成员一致给予批评：

江青：炮打谢富治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应当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指聂元梓）。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繁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

康生：谢副总理是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

谢富治对于昨天的调解会议，给了含糊其辞的说法：

谢富治：昨天，小将们打架，我想调解一下，但没有办好。办事应调查清楚。昨天我事情没有调查清楚，情况不太了解，还很急躁。主要是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而且发了脾气，也批评了聂元梓，最后走的时候也没有和聂元梓打招呼。（关键问题是，谢富治不调查就下结论，硬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但谢富治对此避而不谈。）¹

4.14 会议上中央文革诸人讲话的核心，是宣称中央文革是一致的，不容怀疑。不过这种宣称不久就破产了。1967年8月底，关、王垮台；1968年1月，戚本禹垮台。但这两次都没有给出什么说法，毛泽东关于王、关、戚不是好人的讲话没有传达，对他们的罪行也讳莫如深。到了1968年3月27日，江青、陈伯达等终于有了一番不同于4.14讲话的

¹ 四月十四日会议的讲话全文，请参阅胡宗式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ef67570102waym.html

关于王、关、戚的说词，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江青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排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我们，封锁我们，架空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因为他们是黑爪牙，我们把他们端出来，挂起来。”陈伯达：“主要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

两相对照，令人瞠目。然而，对于聂、孙而言，虽然他们早就提出关锋、王力结党营私，却依然是罪不容赦。等待他们的，将是不断的被打击报复。

《北京大学纪事》对于 4.13 炮打谢富治事件，一字不提，当然 4.14 接见就更不能提了，尽管 4.14 的会议是专门为北大开的。就是在 4 月 14 日这次会议上，康生给了聂元梓一封关于抓叛徒的信。同时发生的事，《北京大学纪事》专挑这一件事来写，不敢涉及会议的其他内容。

《北京大学纪事》1967 年 4 月 14 日的记载：

康生给聂元梓写信，说：“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

聂元梓依照康生的信，组织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又称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数力系学生杨建铎任队长，生物系学生师春生为副队长。该兵团选定的成员均送“康办”备案。（该兵团携“康办”介绍信派人到全国 20 多个城市查阅敌伪档案，提审在押人员，凭犯人口供，搜集编造老干部的材料，制造了十多起大案、冤案。其中如“百人专案”，将叶剑英按照中央决定，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 300 多名我党干部出狱，说成是叛徒；搞北京地下党一案诬陷刘仁。他们收集编造彭真的材料，为康生陷害彭真提供了“依据”。）该战斗队人员逐步达到 125 人。¹

¹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 775 页。

抓叛徒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只谈三点：

第一，鼓励红卫兵抓叛徒，是党中央的行为。

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开始，党中央就时刻注意叛徒、特务问题。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20日批示：

阅谭震林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¹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影响极大。

第二，1967年9月16日，在大会堂，召开中央首长接见“天派”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总理有这样的讲话：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总理这句话编者看不到吗？非也。《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仔细研究过这一篇讲话的。从诸多事件中，他们只书写了这样一条：

9月16日 江青讲话说，“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

总理的话显然不合编者之意，就不选录了。

第三，北大抓叛徒的行动，有总理的亲笔批示，也有康生的指示。并且，总理的批示在前（4月3日），康生的指示在后（4月14日），《北京大学纪事》只提康生指示，不提总理批示，这是对历史的正确态度吗？

北大校文革对抓叛徒一事的安排，是很慎重的，新北大公社总部没有人参与此事，完全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42页。

由校文革组织组负责。而且，负责“揪叛徒”的“第二战斗队”也从未公布过任何材料。

笔者和第二战斗队没有联系，不知道情况，希望第二战斗队的人，能出来讲明真相。但有一件事倒是令人深思，1971年2月，清查5.16运动时，我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3月初的一天，在办公楼礼堂，军、工宣队，召开全校的坦白大会，公社方面上台坦白的是第二战斗队的方××，他说在聂元梓的指使下整了周总理的黑材料。我当时感到很惊讶，怎么可能整总理的材料呢？到了1972年，我有了一点活动自由，去见周老师（1964年夏天，我和她一起在北京顺义金盏公社搞过四清）。她说：方××是我们教研室的，他搞的是夏衍专案，只是在收集的材料里提到总理的名字，这不能算整周总理黑材料，只能说是工作上不当。

大会上拿出来的坦白典型，其真相原来如此。这只不过是军、工宣队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搞出来的欺上压下的典型而已。另一个典型是牛辉林，在同一次大会上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还说把北大“五一六分子”的名单交给洪涛了。这真是笑话！众所周知，张建旗那个“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共没有几个人，哪里需要什么名单。至于吴传启、洪涛等人，在反周总理的问题上固然和张建旗是一丘之貉，但他们都是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奸巨滑之徒，哪会去搞什么需要填写名单的“五一六”组织。至于后来为什么把他们说成是“五一六”，并且在全国大抓特抓，甚至把“五一六”变成了无所不装的超级大筐，则将由将来的文革史学者去研究了。

从《北京大学纪事》对三件大事的记述，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大学纪事》编者的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总结文革，首先是真实的文革。按《北京大学纪事》提供的材料来总结北大的文革，只会走入歧途。■

【述 往】

怀念与思考

——我的老师杨晦先生、赵齐平先生

贡安南

我到2015年就满七十岁了，“随心所欲不逾矩”，但一生虚度，岁月蹉跎，惭愧之至。每每思念起青年时代在北大燕园度过的时光，心中难以平静，那时我们有幸与许多泰斗级的大师相遇相识，虽然在那个年代，我们没有学到真知。“登堂而未入室也”，对于那些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师，先生们，我们穷其一生也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们博学、谦虚、刚毅、正直的崇高品德如春风雨露，潜移默化着我们，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杨晦先生

到今年五月十四日，杨晦老师已过世一周年了。但每逢思念起在燕园读书时的情景，总忘不了他，他的形象如在目前，一件件往事又在脑海里浮现。

我是一九六五年到北大中文系学习的。杨晦老师是系主任。听说他在“五四”时期也曾是个爱国的铁血青年。火烧赵家楼时他是首当其冲者，因而他受到人们的尊敬。文化革命开始后，深孚众望的杨晦老师也被加上了诬蔑不实之词。我记得有人甚至对他出身贫农这一条也持怀疑态度，但终究无人能否认这一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北大六食堂，中文系军宣队、工宣队开大会时，对晦老提出许多莫须有的质问。他刚直不阿，义愤填膺，丝毫不示弱，表现出耿介刚直的气概，最后愤然离去。他那种坚持真理、坚持正义的精神和品格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还应该感谢文化大革命，使得我们与系里的老师们密切了关系和感情，在运动中能朝

夕相处。尤其是在六九年底，因为要搞“教育革命”，中文系师生下到平谷县山东庄、鱼子山。住在老乡家里，生活比较艰苦。杨晦老师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仍然和我们学生同住老乡的土炕，同吃一样的饭，每天清晨天不亮还要象军人那样出操。但我们总感到晦老精神奕奕、朝气蓬勃。记得有一次“行军”前，我们见晦老矮矮的个子、瘦削的身材，大背着书包，很精神，就开玩笑说：“杨老师，您真象个小学生！”他听后十分高兴，也欣然以“小学生”自诩。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看来，晦老这么乐观，这么精神，真是返老还童了。

记得在山东庄时，晦老和同学们同住一屋，同学们也经常照顾老人的生活，尤其是杜广仁同学，给晦老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七九年我们去看望他，他还念叨起这件事，还记得起杜广仁的名字，关切地问他的近况。

晦老早在二十年代新文学运动时就曾与冯至等人组成“沉钟社”，与鲁迅先生也有过往来。他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德高望重。然而他平时对待同志，对待我们青年后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使得学生们都愿意和他亲近。七〇年初我们即将毕业离校，晦老邀请我们几个在平谷乡下和他共同生活过的同学到家中做客。那天晚上他特地买来了糖果、茶点，盛情款待我们。和我们促膝谈心、谆谆教诲弟子，真是如沐春风。记得晦老曾对我们讲，他给他的几个儿子取名是“斧”、“镰”、“锄”。以农具起名，我想其意是在勉励子孙要永远保持劳动人民勤劳淳朴的品质罢！

七零年初，我即将被发配往新疆，但身无分文，不得不开口向杨先生借二十元钱，杨先生亲自到三十二斋送给我，真使我万分感动。（后来因家中汇款已到，故未要，托中文系另一位老师奉还杨先生了。）

七九年夏我和一位同学去看望他。相隔九年，见到晦老步履蹒跚，满头银发，精神体力都大不如前了。听他儿子说，不久前因白内障做过眼科手术。现在白天不能看书，故白天睡觉，夜晚看书报、写写文章。此后我曾偶尔见到晦老在报上发表文章，对当前文学谈自己的看法。都是真知灼见，有扶正祛邪的作用。晦老的书房四周全是书橱，书籍盈案。他这样的高龄还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关心当前的文学动向。

临别时，他送我们至庭院外，嘱咐以后再来。这确也是我们的愿望。愿他长寿健康。未料他老人家已溘然长逝。悲痛之情，何能用言语来表达！

杨晦老师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忠贞不渝。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为人正直、耿介。在逆境中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我们晚生以极深的印象。他出身寒微，刻苦学习、孜孜不倦，一生致力于革命的文学活动，一生从事于教育事业，做出显著成绩，真可谓青年的楷模。如今他竟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师，一位高尚的长者。想到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这是令人多么悲伤啊！

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只有在今后发愤努力，将毕生精力贡献于祖国四化大业，庶几可以不辜负杨老师对我们的希望，实现杨老师生前的宿愿。

杨晦老师安息罢！

赵齐平先生

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在三角地北大书店购读赵先生的《宋诗臆说》一书，以下是我读后写下的一段文字，引述如下：

吾师赵齐平先生，四川崇庆人，多年寄居燕南园。虽说宋诗，他的思乡之情，也沛然其中，意在言外，予能心领神会。七四年予调至廊坊，曾访先生家，先生曾留余午饭。

六九至七零年初，北大军工宣队带领系教师学生在平谷山东庄及将军关搞教育革命时，曾与先生同床(大土炕)而寝，感情至笃。在山东庄住老乡久不居住，废弃已久的土炕，先生曾引薛道衡诗云：“户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实际情况也确如此。先生学问深厚，据说在北大讲课很“叫座”，常常座无虚席，乃至窗外走廊也是听课学生。

校庆百年时，余在北大书店购得此书，距先生原住处，燕南园东南角的斗室(汤用彤先

生故居，赵先生只占其一隅)仅咫尺之遥。然先生已作古。今读先生文，不禁涕泣泪下。先生音容笑貌如在目前。读先生书，犹如耳提面命，重聆教诲。古人云：文章千古事，不朽之盛业，良有以也。

此书的跋为北大出版社梁惠陵先生所书——

《宋诗臆说》是赵齐平同志1989年应我之邀定下的选题。当时他患尿毒症已经五年，每隔二、三天就到医院去做一次透析(周身血液过滤)，这本书是他在患病期间顽强拼搏、呕心沥血撰写出来的，历时三年多，于1992年底完稿。

赵齐平同志是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潜心研究宋诗数十年，功力深厚。他勤于思索，肯于钻研，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学识渊博，讲课中常有高见、创见，甚受同学欢迎……在病床上，赵齐平同志婉拒家人代劳，忍受着疼痛，坚持自己抄写誊清，边抄边改。他那逐字逐句逐段逐篇仔细推敲、精益求精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

1991年，在原有病情上，医生又发现他有主动脉夹层瘤，血管随时面临破裂的危险。但他面对死神，泰然处之，仍坚持不懈继续写作。1993年2月25日病逝，终年59岁。

这本《宋诗臆说》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精神财富，也是他对社会的无私奉献。赵齐平同志虽死犹生。

我所以大段引用，是为了说明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先生是个非常简朴的人。在我印象里，北大几乎所有的先生都是很朴素的，很少看到西装革履，衣着华丽或是浓妆艳抹，披金戴银的人。先生经常着一袭蓝色的中山服，衣服褪了色，但洗得很干净，整洁，朴素而大方，见人总是面带微笑，态度十分谦逊，和蔼。我班有几位调皮的学生戏谑地称他为“大嫂”。

1969年教育革命，我曾与他在山东庄、将军关一个炕头。有一次，我与另一位同学发

生口角，争执，我差点动手打人。事后赵先生严厉地批评了我，他的教导是对我真正的关怀和爱护，至今难以忘怀。

遗憾的是在校期间，未曾听过先生授课，在极左思潮横行的畸形时代，“大老粗”最光荣，“知识越多越反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教师搞不好就被视为“放毒”，“宣扬封资修”。知识分子有一种生来就有的“原罪”。

我记得徐通锵先生曾当着工宣队员的面说，“我们学的都是些没用的东西。”赵齐平先生曾对我们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说，学古文有什么用，把它砍掉算了！（大意）

现在看来，先生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在那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迫害、虐待甚至虐杀知识分子的畸形世态下的愤激之语。

前不久，我曾读到一篇文章，讲文革后期，赵先生也被裹胁入“梁效”写作组，当时被裹胁的还有象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大学者。“四人帮”垮台前夜，林庚先生也曾被裹胁加入这个写作班子。那时，知识分子是弱势群体，是被改造、被奴役的对象。当政者发话哪有不从之理。何况江青一伙打着毛的旗号。

“四人帮”垮台后，赵先生受到审查，被诬为反对周总理。赵先生悲愤莫名，胸中沉郁，无处倾诉，大雨之中久久地徘徊于未名湖畔，因而患重感冒，转移成肾炎、尿毒症，最后英年早逝。

是谁杀害了他？是极左思潮，是奉行极左思潮的军工宣传队！是文革那混乱畸形的世态！

我想赵先生的病早在下乡所谓“教育革命”时就恐怕落下了。你想老乡多年废弃的土炕，又冷又潮湿的屋子，睡在炕上，怎能不病？！

中文系还有许多可亲可敬、道德文章堪称典范的老先生。在这里我讲两则逸闻趣事。

我班(文一(二))的吴用耕、卢盛才与我同宿舍。深更半夜，为一个字起了争执，两人赌气，即刻相携去燕南园敲开王力老先生的家，让他品评定夺。

另一次，我与班上一同学借了一辆三轮车夜晚要到天安门刷大标语，车须打气，于是

找到林庚老先生家，林先生竟然拿出自家气筒亲自给打气。回想起来，我们那时真是少不更事啊！但从另一面可见先生多么可敬可爱、诚恳待人，爱护青年。

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一直采取整肃态度。当政者直到文革仍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名家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就曾改过北大一幅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池浅”改为“池深”。从《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到“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四清，直至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相反犬儒主义盛行，一派歌功颂德之声。

我印象最深的是军工宣队入校后，组织我系教师每日到三十二斋与学生开会，搞斗、批、改。换言之，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我系一位德高望重，颇有造诣的老教授在检查中动辄称自己父母为“狗爹”、“狗娘”。（据说其父母曾是一贯道坛主）古人常称“天地君亲师”。《诗经·蓼莪》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谁不怀念、感恩自己的父母呢？然而，在那个畸形的时代和强权的压迫之下，这位老先生竟然这样自我作贱，自我埋汰，难道他是真心话吗？当然不是，是被逼，是迫不得已！至今思之，令人痛心疾首。

以上这些先生都早已作古，我写这些话，是为了让后人知道，中国历史上竟然还有这样的时期，这样的人性扭曲的世态。■

简历：贡安南，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1970—1971年在新疆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半。197—1974年在燃化部新疆运输公司乌鲁木齐大修厂政工组工作。1974—1979年在河北廊坊华北输油管线指挥以及运输公司任秘书及宣传干事。1979—2005年在中石油河北廊坊管道局技校、中专、管道学院（大专）任教。副教授，著有《何博士备论译注》、《幼学古诗》（清）王韬《瀛壖杂志》标点注释。书法、篆刻曾在国内外多次入展。

【述 往】

北大汉中分校的一段生活回忆

陈金松

我于1962年9月-1968年12月在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读本科。原定计划6年制于1968年7月份毕业，由于搞文化大革命却延长至1968年12月底才毕业。

1967年2月还是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位于陕西省汉中市)正在建设期间，建校的冶金部直属某建筑公司的工人先是自身分成两派群众组织，后来其中一派群众组织垮台后，又介入了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两派斗争。北京大学总部原来派技术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65年9月入学的)到汉中分校一边上课一边看守分校校园，并保护当时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他是力学专业，原来就分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又是党中央、国务院内定北京大学3名保护对象之一。为了避开当时北京大学总部混乱局面，他就被派往北京大学汉中分校。

建设汉中分校是遵照中央的布署。1965年中共中央指示要准备打仗，把我国西部地区称为三线，把一些重要大学和骨干企业迁到三线，北京大学计划第一步先把保密的系或专业——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子能科学技术的)、无线电系与数学力学系中力学专业迁到分校。因为1980年中共中央改变了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取消了三线建设布署，北京大学也取消了汉中分校，上述计划也没实现。

由于一年级学生年轻又不熟悉党的政策，而我们四年级学生年令稍大点，又经过社教运动锻炼比较熟悉党的政策，所以学校总部决定加派我们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去汉中分校。后来据说中央有个通知，中央领导干部子女不要介入地方两派斗争，邓小平之子邓扑方当时是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而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已介入当地两派斗争，于是学校总部又把整个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四年级学生都撤回北京，而换上技术

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四年级学生。而我正是这其中之一，所以也被派往汉中分校。

我是1966年12月从北京返回福州看望病重父亲。后父亲病故，待我处理好丧事约1967年2月10日返回北京。还有几位同学也因故没赶上和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去汉中分校，所以我们余下几位同学一起立即启程跟去汉中分校。到了汉中火车站，从汉中火车站到汉中分校还很远，当时没有公共汽车，由敞篷卡车接我们到汉中分校。那时还是冬天，寒风凛冽，好在我们都是20多岁青年学生，身体都可以抗住。

一到分校，由何以堂老师（北京大学生物系的，留学苏联，当时任汉中分校行政干部）给我们介绍汉中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他说北京大学学生到汉中地委公安处了解文化大革命情况，该公安处干部尚德俊介绍情况时，其言论有重大问题。我们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支持的这派群众组织要揪他，但另一派群众组织要保他。两派群众组织对立着正展开斗争。我仔细阅读了尚德俊录音讲话稿，觉得谈不上反革命言论。但是我只是一位普通大学生，无能为力改变当时现状，所以我一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于是由我起草了一份给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领导的报告，报告中心意思为，1967年初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现在，大学生不要再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否则就要帮倒忙了。根据此讲话精神，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应该不要介入当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不管历史上对陈伯达如何评价，然而这讲话至今看还是对的。起草好这个报告，我们几位同学一边传阅，一边讨论，一边修改。此时同学中出现不同的意见，即不同意我们的看法，甚至有的同学没经我们同意把报告草稿送到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负责人处。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有一位同学知道后非常生气，他说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同学之中来了。我当时倒无所谓，因为这些观点我并不想隐瞒。最后在这个报告签名的有：丁治元、秦铁民、陈金松、郭亮天、徐仁祥等5名同学。

当时北京大学汉中分校负责人是中共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戴新民。她原是国家计委的一位司长，9级干部，其爱人是当时国家计委副主任宋绍文，她因涉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洩密案，受处分被下放到北京大学。她看了报告后只说，报告没肯定北京大学汉

中分校师生参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她殊不知，正是我们对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参加当地文化大革命情况有看法，但是我们又惹不起他们，所以干脆就不提此事。事后我们得知，戴新民用长途电话请示了当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聂元梓，聂元梓说，如果他们愿意回北京就让他们回来吧！

我们班第一批从汉中分校撤回的有：丁治元、秦铁民与我3位同学。从汉中分校到汉中火车站学校派一辆卡车送我们。班主任金天柱老师送我们上卡车时对我们说，你们班绝大部分同学都留在这里，你们就舍得走了？我当时回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自毛泽东的话，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引用毛泽东的话）火车经过宝鸡火车站时，我还买了一只烧鸡3个人一起吃，庆贺我们抗争的胜利。

1967年6月在北京的我们班有些同学参加北京市郊区麦收，当时主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孙蓬一老师，代表学校领导去看望我们。我上前和他说，参加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北京大学师生应该撤出。他说对。于是我心理更有底了。

实际中发生的情况不幸被我言中。汉中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先是出现低级化、庸俗化。例如，我们班一位女同学刻蜡版把“毛主席与他亲密战友”刻为“毛主席与它亲密战友”，结果对立派要揪她，当时居然有人同意交出。幸亏查出原文来自《首都红卫兵报》上也是这么写的，才得以幸免，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又如，我们班一位男同学到汉中某文艺单位串联时遇到如下情况——两派群众互相揭发对方生活作风问题。一位女同志居然对该男同学说：“我搞得最少，才两个男的。”言外之意，她的生活作风问题不大，还比较正派，应该是依靠对象。事后我们听说时都捧腹大笑。

4月14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群众组织到专区公安处静坐绝食，要求按“现行反革命”批斗尚德俊等。汉中分校师生参与了绝食斗争，绝食时用高音喇叭呼口号，唱歌曲——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万岁！“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耐雄那尔，就一定要实现。”（国际歌）等——口号与歌曲都不错，只可惜被玷污了。我们班一位同学饿得实在受不了，中途还偷跑出来吃东西，被人看见好

不尴尬！绝食静坐对公安处压力很大，在军分区的协调下，第七天被劝阻罢坐。

1967年6月起，两派在揪抓、夺权中，观点分歧，由激烈辩论，互相攻击到互骂互打，开始用石头、棍棒，小范围磨擦打砸，进而不断升级，继之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真枪实弹相斗。观点不同者，在辩论、揪斗中势不两立。1967年7月初，两派以石头、棍棒多次武斗后，气氛紧张，武斗人员不敢在本单位住宿，开始集体过夜。8月17日，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一名学生被打死。8月19日12时25分，由该派某头目指挥，在汉中城北汽车站，用一辆汽车为掩护，将炸药运至对方占据的汉中汽车运输公司新建的一幢三层职工楼前，一声巨响，楼房炸毁，32人粉身碎骨，伤30多人，其中致残4人，重伤9人，为本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最大最惨的事件。

接着出现大规模武斗，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卷了进去。一天晚上，我们班一位同学与本派一位群众坐在屋里，突然一声枪响，那位群众应声倒下。我们班那位同学因为没坐窗前，所以倒下的不是他。吓得他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于是许多同学包括金天柱老师都陆陆续续地返回了北京。一位较早返回北京的我们班女同学在大饭厅碰到我时还对我说，让历史来验证你们（指在该报告签名的人）对错吧！应该说后来他们能够顺利地返回北京，没有受到伤害，是得益于我们那个报告的。

何以堂老师也回到了北京，但是在1968年12月北大开展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跳楼自杀身亡。何以堂老师当时不到30岁，政治上也是极其不成熟。有一次，一年级一位男同学与对方派别群众辩论时发生推搡动作，对方说我方打了人。当那位男同学回来汇报时，何以堂老师问他打人的吗？何以堂老师的眼神告诉他，应该说没打。但是那位男同学才19岁，比较老实，喃喃自语地说，打了。何以堂老师立刻说，嗨！打人决不能承认，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我们当年留苏学生到列宁墓前送花圈，打了xxxx就说没打。

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师生支持的那派群众组织某头头也被枪毙。这个造反派很色，看到某位漂亮的女同学戴着毛主席像章上去就抢，名曰抢像章，实是摸胸脯。1968年9月该群众组织头头还到北大看望过我们班有些同学，大概是探听风声，但回去不久后就被逮捕。

这段生活已经远去，但是我们从中可以悟出，一个人一定要有独立思考精神，陈云有个九字真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这也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作为“五四”运动的传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五四”运动的精神——科学与民主！

如今我们同学都已达到70岁以上，在人世时间已经不多了。写这段回忆不是在争论谁对谁错，谁高谁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都参加了，都听了毛泽东的话，都犯有错误，都是受害者，都不可能是一贯正确，如今如果再去争论当初谁多一点错误，谁少一点错误也没有什么意义。当年出现那些事也只是说明，有些人成熟早一点，有些人成熟晚一点，成熟晚的同学可能被“左派”蒙蔽而已。

我们这代人行将离世，如果再不及时总结这段历史，不吸取教训，文革或类似文革事件还可能重演，那么我们这代人就是对后代人不负责任！当然回忆文章主要对事不对人，对涉及到消极事件的人要尽量含糊，以免影响团结。同学之间应该和为贵吧。我们今天要提倡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把这做为共同财富留给后代。薄熙来事件应该给我们全国人民敲起警钟！■

2015.8.14 定稿

作者简介：1944年出生于福州，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述往】

文革高潮，书山探宝¹

俞小平

196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四旧”遭殃。“四旧”者，旧思想、

¹ 此文选自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一九六三级330班为纪念入学五十周年而编印的《330轶事》一书。该书收入了顾仁虎、何法信、俞小平、梁正路、黄孝华、叶成炯、陶令煌、张铁壁、左伯莉、郑世忠等人撰写的57篇回忆文章。于2015年9月第一次印刷，文字编审是顾仁虎先生。本期《述往》专栏所刊载的俞小平、何子溪、叶成炯三人的文章皆出自此书。（本刊编者）

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者也。自从八一八那天老毛带上红卫兵袖章，“老”红卫兵们自觉有了圣旨，就以《红卫兵通告》向四旧宣战了。打砸抢抄抓，全武行一齐上演，一家被害，四邻自危。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快摆脱家中涉嫌四旧之物，比如图书、古董、首饰、唱片等等。我和班上的一些同学是反对这种暴力摧残文化的行为的，但是我们对于这些暴行也无能为力，只能自保而已。北大自大串联开始后，仿佛成了一个大串联中心，专事接待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小将”。日子过得很无聊，我就在十月份打道回府，回南京的家去了。到了12月，有同学来信招我回校，说是要搞军训。我就在12月中旬回校了。

我在一些同学的宿舍里看到很多以前没见过的书，就问这是哪儿来的。有同学悄悄地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原来我跟几个同学在“红八月”外出大串联时，我们班的一些书蠹虫看到很多人在废品站卖书，以废纸价把家中可能招惹麻烦的书籍摆脱掉。想这么做的人很多，废品站门口排大队，倒像是在抢购什么短缺商品。我们班的书蠹虫们看见排队的人们手中的书不乏精品，就跟人家商量“你把书卖给我好不好”。人家说你干嘛呀，我们的书蛀虫说看中了里面的几本书。有这好事何乐不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卖书的人拿着钱高高兴兴地走了。我的同学们就排队卖掉不要的书，然后抱着几本精品再去物色下一个目标。做了几回，撞在枪口上了，无巧不巧碰上了“中国书店文物抢救队”，端着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的同学。那时北大学子的牌子还是很硬的，总算全身而退。不知道是谁的路子，发现位于东郊的燕京造纸厂也肯以废纸价卖书给需要的人。书蛀虫们上系办公室开了一张介绍信，说要到燕京造纸厂廉价购买马列毛著作。这样积极要求进步，系办公室当然要大力支持，介绍信敞开了的。支持的结果，大批精品书籍流入了我们班的几个宿舍，尤以420宿舍为甚。我被说得心里痒痒的，就问什么时候再去？回答是明天。

明天转眼就到了。擦黑的时候，我们几个悄悄地骑车到了东郊的燕京造纸厂。干嘛晚上来？哥们儿说这事怎么说也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掏出介绍信，外带几份红卫兵小报（这在当时是最好的行贿材料），我们进了造纸厂大门，灯光下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座巨大的废纸书堆，就要进入纸浆池化成造纸的原料。一个书堆有五六米高，五六米宽，二三十米长，

整个原料场有十几个这样的巨大书堆，一个警卫肩背一支步枪在书堆周围晃荡。我们扑到书堆上，如同入山探宝，在一捆捆的书中寻找想要的书。大部分书都没什么劲，学习资料啊，课本啊什么的。时不时会发现有价值的好书：苏联小说、欧美小说、中国古典小说、欧洲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司汤达尔……等等。其中大部分都是明显的“四旧”。我带了一个大提包去，把书装满了一提包，最外边是装门面的马列著作。忙了一个多小时，看着巨大的书堆意犹未尽，我们把书装上自行车，推到造纸厂门口，过磅称重付钱，门卫装装门面看了一下就放行了。我们冒着嗖嗖的冷风，骑车回校。

半个月之后，军训开始，军代表进驻，我们就再也不能出去干这样的勾当了。

我们班的420宿舍里的几位是最积极于收集书籍的，他们的床底下塞满了各种书籍，据估计有一吨之重。其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420宿舍的同学们历经危难，却没有人打他们的书的主意。记得工宣队进驻后，程汉良和刘立民被隔离审查、秘密关押，主管我们班的工宣队张师傅召集我们在420宿舍围着书桌开会讨论程汉良的问题。张师傅说着说着，忽然叫我打开我跟前的程汉良的抽屉，气愤地说：你们看看他读的都是什么！我拉开抽屉，看看抽屉里的书，几本书都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心想这是怎么啦？共产党不让读马克思主义吗？这叫什么水平啊？当然我没敢说出来。林彪不是要大家只读毛著吗？弄得读马克思都有罪了。我知道这些马克思著作也是从造纸厂淘来的。张师傅气愤归气愤，竟然没想起来没收这些离经叛道的马克思著作，真是怪哉。

我只去了燕京造纸厂一次，弄到的书是最少的。我最珍爱的一本书是十九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和文学艺术评论家丹纳著、傅雷译的《艺术哲学》。这本书四十多年来一直在我的书架上放着。由于年代久远，书脊已经散开，但是我仍然时不时拿出来读几页，体会欧洲艺术的魅力，回忆当年淘书的乐趣。■

附注：陶令煌同学的回忆录提供了此事的准确过程，使我得以改正一些误记，在此感谢。

2013年9月25日

【述 往】

我参加了1966年7月29日的大会

俞小平

一九六六年六月，聂元梓大字报一声炮响，如同一座超级火山，引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往往自觉生得太晚，既没有赶上抗日战争，也没有参加抗美援朝。这回好了，北大的学生一下子落入文革漩涡的中心，亲身参与这场伟大的革命。刚开始时，因为六月初我们尚在北京郊区参加“四清”，未逢五月底的聂元梓大字报攻守之役，接受造反的洗礼和考验。从六月初到七月底，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我们已经亲历工作组的进驻，夺走原校党委大权，又见中央文革诸位首长亲临教导，把工作组打倒在地，大权交到聂元梓手里。此时我的观点却是保工作组的，当了一回保守派。此役站错了队，心中不免惆怅，原来自己的革命觉悟确实不高啊！

自入北大以后，我在班上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可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之际，我沾了“出身好”的光，同学们开始选我担任一些班上的职务。七月二十九日，校方通知，每班派一人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全班同学投票选了我。坐上斯柯达大客车，到天安门广场下车，走进人民大会堂，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只见万人礼堂里，呜呜泱泱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我们北大同学的座位在一层比较靠后的地方，在二层座位的下面。大家伸头缩脑地四处张望，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惊叹这座建筑的宏伟壮丽。

开会的时间到了，各级领导干部走上主席台就座，然后就来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领袖级的领导人。全场起立鼓掌欢迎之后，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开会。我这才知道，我被选派来开的这个会叫“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哈！我都不知道我是“文化革命积极分子”，李雪峰和新市委怎么知道的？在我们班上，这个头衔真的轮不到我的头上。

李雪峰致开幕词后，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讲话。刘少奇讲了著名的“文化革命怎么搞，我也不知道”。当时没有觉得异常，只觉得刘主席真的很谦虚，党的领导人里排名第二的领袖竟然对我们这些大中院校的学生这么谦虚，实在是很大。我所不知道的是：刘主席真的不知道这文革是怎么回事，他只是觉得大事不好，实际上已经大难临头了。我和大部分与会者一样，匆匆忙忙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争取一字不拉。在领导人讲话的停顿处，我们还要鼓掌，真是够忙的。刘少奇讲话结束，我还在伏案疾书，纪录他讲话的结尾部分。

突然间我听到四周轰然巨响，人们纷纷起立，座椅发出的响声已经被近万个喉咙里冲出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掩盖。我不明所以赶快站起来，这才发现，全场人员都已起立，主席台上所有的人也都起立，一个身材魁伟的人慢慢从台边走到主席台的中间。毛主席！毛主席慢慢地走着，一边也在鼓掌，然而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全场近万人，包括我自己，都在有节奏地鼓掌，有节奏地狂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整个万人礼堂充斥着巨大的声浪，仿佛要把这座宏伟的建筑抬起。一些坐在后面的中学生们不顾规矩，跑到走道的最前端去看毛主席，真是无组织无纪律！几分钟过去了，毛主席走到台边消失了。李雪峰宣布撤销新市委派驻各校的工作组，然后宣布散会。然而人群高昂的情绪并无消退，鼓掌和欢呼仍在继续。怎么了结这样的状态啊？这时周恩来表现了他的高超的掌握群众情绪的艺术。他走到主席台中央，让人搬来一把椅子，他站到椅子上，指挥学生高唱《大海航海靠舵手》。这样学生的情绪才慢慢缓和下来。李雪峰宣布散会。从人民大会堂里倾泻出来的年轻学生们，个个眼中都是革命的狂热，和参与国家大事的得意。

回到班里，我赶快通知同学开会，向同学们传达大会过程，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我看出同学们眼中的羡慕之意：这样的大事这么让这小子给摊上了？我不知道，这些讲话仍然是站在党内保守派的一边，仍然站在当场未发一语的毛主席的对面了。

到了年底，我才知道这次我又站错队了。如今49年过去了，我终于知道这文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什么站对站错，都是瞎掰。■

写于2015年5月13日

【述 往】

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赎

——废品收购站寻宝记

何子溪

1966年6月，伟大领袖振臂一呼，全国上下便陷入一片狂热和疯癫之中。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工厂停工，各级党政机关瘫痪，大中小学的学生全部停课闹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原来的许多当权者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纷纷被拉下马，成了专政的对象，丧失了起码的人格和尊严，被戴上高帽子到处游街示众。与此同时，“破四旧”也如火如荼。除了毛泽东和马恩列斯著作外，其它一切书籍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变成了封资修的东西，甚至连男人留的胡子，女人的长发，身上的裙子和高跟鞋也统统成了革命的对象，统统列入到横扫之列。

记得我们核物理班的罗泽中同学原来留着很长的山羊胡子，常以美髯公自悦。文革开始以后，他却迟迟不肯把胡须剪去。一天在北大小南门外偶然碰到了一群“破四旧”的红卫兵，十几个人气势汹汹地围着他非要剪掉他的胡子。罗同学一手捂着胡子，一手抵挡众人明晃晃的剪刀，嘴里还不停地辩解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么长的胡子还不是一样闹革命嘛！”但中学生们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把他剪成了秃嘴巴。尽管他大喊大叫，极力反抗，但仍然无法抵挡众多红卫兵的强大攻势。

一时间书店关门，图书馆被查封。因为马克思喜欢红色，于是红色便成了革命的象征，举国上下凡是能涂上颜色的地方一律被涂成血红色，神州大地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就连那“无产阶级恐怖万岁”的大标语也要在下面滴上几点类似人血的红墨水，以示革命者的无畏与无情，看了都令人毛骨悚然！特别是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看到这类标语时总是感到不寒而栗。当郭沫若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统统付之一炬的时候，一些专家学者和走资派

的家藏书籍被抄。更多的人害怕引火烧身，纷纷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当作废纸送到了废品收购站。学生们怀揣一本红宝书就可以包打天下，成了自己革命的唯一精神食粮和本钱。专业书是绝对禁止的，否则会给你戴上“白专”的帽子，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其它文学艺术类的书籍也统统被列为禁书，即使你想看也找不到，这对于渴求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痛苦。偌大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成千上万的大中小学生正处于追求知识的年龄，整天无所事事，无书可读，那滋味实在不好受。当然也有一批天不怕和地不怕的人敢于顶风而上，自谋出路，那就是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化专业 330 班的一帮“痞子们”。

在文化革命中，提起技物系的 330 班，恐怕全北大几乎无人不晓。他们思想活跃，无视各种禁忌，蔑视当时疯狂至极的极左思潮，更不满各种打砸抢的过激行动，敢于直抒自己的意见，顶风而上。大家当然也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只好采取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发泄自己的情感。

文革前海淀有一个旧书店，是北大穷学生经常光顾的地方。文革不久，八一中学的一帮红卫兵声称是封资修的黑店而要查封它。这下可惹恼了 330 班的一批旧书店的老主顾，我们班十几个同学主动出击，连续几天与那帮左得可怕的中学生们展开了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拉锯战。激烈的辩论甚至推推搡搡使一些好心市民们都为我们担心，偷偷地劝我们不要与有组织的红卫兵对抗，但“痞子们”还是据理力争。当然终究还是没能抵挡住穷凶极恶的滔滔洪水，没能挽救旧书店被查封的命运。这使我们认识到，在那个极度疯狂的年代，有组织的极左行动的破坏力是巨大的，为读书我们不得不另蹊径。

我们班里外号叫“萝卜”的同学可以算是众多“痞子”中的佼佼者，地地道道的北京油子，调皮捣蛋的高手。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又特别爱交际，所以老北京的大街小巷他都非常熟悉。他为人义气热情，乐善好施，结交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都有，因此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常常向大家传播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此兄长得五大三粗，像个典型的农民兄弟，但人却非常聪明。他安装的收音机其质量无论是音质或灵敏度，甚至选择性上无

人能比。他那无师自通的木工活也相当于五级工的水平。

正当大家因精神匮乏而饥渴难耐的时候，陶令煌和“萝卜”偷偷地告诉我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东直门外的一个废品收购站最近收购了许多“四旧”书籍！问题是我们以什么名义和什么方法才能搞到手。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第二天一早在陶令和“萝卜”的带领下，我和程汉良、俞小平五人便直奔东直门外。我们以北京大学为工人同志送中央首长讲话资料的名义，与收购站的领导接上了头。当时北大可谓是文化革命的圣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威名全国，不仅她本人一时间红得发紫，连北大的学生也跟着老聂沾光，到处受到人们的赞赏和推崇。那位领导看到北大学生亲自将中央文件送到一个废品小站，真是感激涕零，一再表示感激之情。

“假传圣旨”意外成功后，我们提出希望从这里购买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来武装自己的头脑。那领导看来文化程度不高，他本来就对北大的学生充满崇拜之情，又听说要从旧书中选购一些马列的著作，学生爱学习是好事啊！自然是满口答应，慷慨应允我们随意挑选。“阴谋”得逞了，“满怀鬼胎”的我们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来不及道谢，纷纷向那一座座小山一样的书堆冲去，各自寻找自己喜欢的书籍。

这里的各类书籍堆积如山，品种也极多。虽然也有政治书籍，但大部分都属于“禁书”，这使我们欣喜若狂，真想把所有的书都统统带走，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只好拼命从其中翻找自己最喜欢的书籍。我喜欢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诗词，程汉良和陶令煌喜欢西方小说和哲学，俞小平则喜欢欧美和苏联的侦探或科幻小说，“萝卜”只捡些中国武侠类小说和无线电之类的科技书。大家各取所需，都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一刻不停地在书山中翻找，忙得连午饭都顾不得吃。从早晨八点一直翻捡到下午五点，每个人都挑了一大堆。虽然个个都累得腰酸背疼，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矿工一样，身上和脸上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但心里还是充满着发现新大陆和如获至宝的喜悦。

书挑好了，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瞒过收购站领导的眼睛，把我们的辛苦收获顺利带走。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在陶令煌的提示下，我们把每本书的书背朝里，再将两摞

书背对背地并在一起，这样从外面就看不到书籍的名字。然后又在每一捆书的上下各放上一两本马列的著作以掩人耳目，最后用绳子把它们横七竖八地紧紧捆住。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灵，那位领导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表面，便以每公斤0.27元的收购价过秤交钱。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十公斤，匆匆忙忙地扛到门外，由“萝卜”从家里找了一辆地排车，一路谈笑拉回了学校。

既然是禁书，阅读时也必须特别小心，决不能让不熟悉的人知道或看到。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看这类书籍是十分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被打成反革命或封资修的孝子贤孙。有多少人只因无意间说了一句错话甚至梦话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又有多少朋友、亲戚、兄弟，甚至父子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反目成仇！我们系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就因为在梦中含混不清地喊了一声刘少奇的名字，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好在我们班的同学思想比较开放，相互也比较理解、宽容和信任，又善于把政治问题化解成恶作剧式的笑话，就连最革命的人也很难抓到把柄。这批书成了大家争相阅读畅销品。我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并且与好友老郑一块欣赏和评论。如果说十年文化革命还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大概就是认真阅读了这些宝贵的书籍，使我们增长了不少知识和阅历，提高了自身的文学素养，也算是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救赎吧！

后来我们几个兴犹未尽又去了一次那个收购站，仍然如法炮制，很容易地又挑选了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哲学和文艺作品。领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很想感受一下异域文化的风味。这一次我挑选了大量外国名著，包括世界历史、西方哲学和文学名著，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复活》；屠格涅夫的《罗亭》、《猎人笔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伏尼契的《牛虻》；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格列佛游记》；夏绿蒂的《简爱》；莎士比亚的戏曲集；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小仲马的《茶花女》，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特》、《邦斯舅舅》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九三年》、《悲惨世界》；斯汤达尔的《红与黑》，莫泊桑的小说选等。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天才三部曲》，海明威的《老

人与海》等。另外还找到了几本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狄德罗、伏尔泰和卢梭的哲学著作等。从这些西方小说和历史哲学著作中我逐渐理解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含义，领略了西方社会发展的脉络、动力和欧美文学的写作风格。另外，对资本主义文明和西方的价值观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后来几次搬家，这些书虽然大部分都丢失了，但从中学到的知识和由此产生的人生感悟却没有丢掉，而且终身受益，这些书籍不仅帮助我渡过了漫长而无聊的文革岁月，而且对我以后研究科学史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文革耗费了我们十年的大好年华，给同学们的身心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对我们的一生产生了惨痛的影响。但每当回想起那次买书的经历，仍然感到幸运和高兴。■

【述 往】

令人难忘的收音机

叶成炯

1968年春天，班上掀起了组装电子管收音机的热潮，我也加入其中制作一台收音机。我用节省下的零钱，从海淀镇洩水湖废品收购站买来底盘、旧电子管、双联、中周、喇叭、变压器和电阻电容等小零件。按照刘立民给我的一张超外差式收音机的电路图，从郭直惟那里借来一把电烙铁，依葫芦画瓢地对照电路图一点一点焊接起来。由于什么都不懂，一有问题就找刘立民或者罗英铭指导。大约用了一周时间，一台没有外壳的裸机装配成了，迫不及待接上电源一试，只有呜呜的交流声，收不到电台。赶紧找刘立民帮忙，经过他的一番调试，收音机终于发声了，心中别提有多高兴了。这台简陋的收音机只能收听中央台、北京台和天津台等几个电台，内容也很单调，除了新闻就是八个样本戏。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当时很喜欢听《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的音乐。当然更重要的学会了装配、调试和维修收音机的技能，使我受益非浅。

后来我在校园里找了几个废旧木板，做了一个收音机外壳，还刷上了棕红色油漆，把裸机装进去，真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收音机了。

1968年3月29日凌晨，北大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致使双方一百多人受伤。许多同学在武斗之后纷纷离开学校回家。为了躲避武斗，刘永顺邀请我到他家暂住几天，于是我同他一道去了东北旺的家中。我在刘永顺老家住了一个星期，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直到今天都还记得那香喷喷的白面馒头，金黄色小米稀饭，特别是他父亲做的大葱暴炒羊肉，细嫩爽口，令人终身难忘。

4月中旬，接到父亲的来信和15元汇款，要我回家。于是我买了火车票，用床单包好我的收音机，从北京站登上了去成都的列车。一路上，我思绪万千，想起许多往事。

自从1957年父亲在整风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后，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从教师岗位调到教务处当职员，每月工资从86元降到57元。1959年国庆节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到1963年我上大学时，上调一级，每月工资63元。一家七口全靠这点微薄的收入的生活。经常都是入不敷出。母亲除了精打细算之外，又帮助别人洗衣物。每月大约能挣10多元补贴家用。我上大学后，学校每月给了我12.5元的伙食补助，父亲每月给我5元生活费。因此这次回家父亲寄15路元费给我，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用12.5元买了车票，就没有钱给父母和四个妹妹买什么东西了，只有把我组装这台收音机带回家，给他们一个惊喜。

经过两天一夜的路途，下午6点左右火车将要到达成都了。我们被告之，成都（北）客站正发生严重的武斗，不能停靠，只能到成都东（货）站下车。列车到站后，在车站乘务人员的带领下，全体旅客排着队，徐徐走到站外。我走到公交汽车站，一打听，由于武斗的原因，公交车已经停运。只好步行回家了。一路上，暮色沉沉，商店关门闭户，几乎没有行人，清冷得令人害怕。我紧紧拎着收音机，沿着大街快步地走着，恨不得马上到家。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步行，终于看到了成都九中的大门，走进入了熟悉的家。父母和妹妹们与我喜极而泣，一家人高兴得乐开了花。我迫不及待地打开包裹，亮出了我的收音机。

接通电源后，一拧开关，居然响了，收音机里传出了阿庆嫂的唱词，全家人非常高兴。我调了一下电台，能收到中央台、四川台、成都台和重庆台，还可以收到云南台和贵州台。从此以后，这台收音机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吃过晚饭，全家人围着收音机听新闻，听样板戏，听云南台的民族音乐。父亲最关心国内外的新闻，由于没钱订报纸，只好每天去收发室蹭报纸，赶在别人取走之前匆匆浏览一下。母亲最喜欢听戏，特别是川戏，现在听不到，改听样板戏了。有了这台收音机，他们在家里就可以乐得其所了。

6月中旬的一天清晨，一阵激烈的枪声在九中校园响起。九中两派红卫兵发生了武斗。学校乱成了一团。老师们携家带口，纷纷外出躲避。我们也准备出去避一避。临走前，母亲用一块布把收音机包起来，让我拎着。她说，这是家里最宝贵的东西了，带走吧，不要被别人抢走了。我们在郊外躲了一整天，听说一派被打走了，校园也平静了，我们才在晚上八点多钟，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回到家，母亲先让我试试收音机坏了没有。我插上电源，拧开旋钮，收音机里传出了播音员的声音，她才露出了笑容，放心的去做饭。

在家里呆了四个多月，接到进驻北大的工宣队的通知，8月下旬我回到学校。不久，收到父亲的来信，告诉我大妹二妹响应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去了绵阳地区安县黄土公社插队。三妹（15岁）和四妹（11岁）在家等待复课。特别提到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开设了学英语的节目，三妹天天跟着学习，兴趣很大，进步很快。你的收音机变成学习工具啦。

1969年9月，突然收到三妹的来信。告诉我她当上了英语代课老师。原来成都桓侯巷小学复课后，招了一个初中班，英语老师因为休产假，找不到英语代课老师。父亲的同事介绍三妹去试试。校方觉得还不错，就让她代课了。真是难以置信，一个16岁的初中生，文革中几乎没有上过几天课，就凭着收音机自学一年多，居然走上讲台教英语。真是太不容易了！

后来三妹复课后就读高中，一直坚持收听学英语的节目，还买了不少英语课外读物，自己进行听说读写的训练。她喜欢英语，又刻苦用功，外语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安排到红旗纸箱厂工作，仍然坚持学习英语，提高外语水平。恢复高考后，1978年

她顺利地考入四川南充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因成绩优秀，分配到四川音乐学院任教英语。1984年又调西南民族学院外语系，从事英语教学，直到2008年退休。

1976年10月，收音机里传出打倒“四人帮”的消息，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1978年改革开放后，父亲更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了，天天都要打开收音机听新闻。母亲更是高兴，她最喜欢的川戏在电台也开播了。我家发生巨大的变化。先是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重新走上了教学岗位；大妹、三妹同时从工厂考入成都大学和四川南充师范学院；1979年小妹高中毕业，考入重庆师范学院，后来二妹也考入成都师专进行深造。她们毕业后，都承继父业，走上了人民教师的岗位。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父母家中陆续添置了半导体收音机和电视机。我装配的这台收音机终于在1984年完成了它的使命，不再使用了。

当我们节假日团聚时，提起这台收音机，父母都会说，它让我们了解国内外发生的许多事情，度过了寂寞的时光。三妹说，感谢哥哥的收音机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命运，是你把握住了时代给你的机会，用你的勤奋和努力，改变了命运，成为一个称职的大学教师。

现在，我的父母已经去世多年，我和几个妹妹也都退休了。回忆起这台北大文革期间，在同学们帮助下制作的收音机，它的故事让人回味，令人难忘！■

2015年5月21日完稿

【资料】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代会 各院校代表的讲话

时间：1967年4月14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

江青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大概是七、八天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还和和气气的，几天就吵起来了，还武斗，我心里感到很不安。

我首先讲一下，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全来了。就戚本禹去解决邮电大楼的武斗，过一会就来，和谢富治一起来。这个一致是表示在主流上的，不要想钻空子，你们要懂得，小心有人钻空子，挑拨离间。

我想讲一下我个人对形势的一些看法。六号《军委十条》下来以后，革命小将，革命战友心情都飞动起来了，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条，这十条下来后，很容易很可能犯错误，一定要牢记1.28军委《八条》还是有效的。我认为目前的苗头是放松了对敌斗争，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座谈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批判应该上纲，这个纲应该上到对准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是现在矛盾不集中，很分散，很难斗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个苗头是这几天指向军队。同志们，我们不依靠我们的军队，依靠什么？有人贴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是军委常委。最近几天，我围城转了一下，贴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刘少奇的。他（指李）我不了解，我调查了一下，他还是好同志，只是说错了话，要打倒他这对吗？一定要谨慎，

有意见可以提，但不要上街，叫坏蛋、外国记者都搞去了。打倒李钟奇的大标语超过了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这是反常的，有人钻空子，你们不知道，上了当，是我感觉到的。有人使你们打内战（指地院和北大），还不自觉。邮电大楼已经军管，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支持邮电大楼的红革会，还发生了武斗，完全不维护解放军荣誉，已经军管了，还去武斗。二、三天前，我、伯达、戚本禹叫他们不要搞了，要树立解放军的威信，可是他们还在干，北邮东方红就是支持，就是打。谢富治副总理告诉我，昨天搞了一天（指北大和地院），要一起谈，地院东方红不干，要单独谈，单独谈也崩了。今天我们等了好久，你们还不来，我们不是战友吗？（澄清：红代会给地院东方红打电话晚了。）

炮打谢副总理是不妥当的，是错误的。但不能全赖在聂元梓同志身上。按她的斗争经验，生活经验应该给你们做出榜样。你应该做触及灵魂的检查（指聂元梓）。但打倒谢副总理，一切都归于聂元梓，我没有证据。你们开了广播车去北大是不妥当的，有意见可以提。斗王光英是好事。王光英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王是天津的大资本家。斗他是好事，应该斗。北大的事情很复杂。孔繁做过邓小平的秘书，他反对聂元梓，他难免作挑拨的事，使你们不团结。总而言之，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心里高兴，但放松了警惕，放松了对敌斗争，计较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我今天是批评你们的，特别是聂元梓同志，她斗争经验、生活经验比你们多，应该做出榜样。这次她应该负多的责任，但你们不能把大字报、大标语上街，使香港的报纸登上了，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新北大到处出刊物，净闯祸。凡属军管，那个单位就是有错误，有缺点，要维护我们自己解放军的威信，有意见可以提，不能把解放军不放在眼里。广州对外贸易展览会被搞了。总理今天早晨乘飞机亲自去解决。（康老插话：明天要开会，今天给搞了，所以那里军管了。）李钟奇也不要贴了（谢副总理：已经让北航派人去贴掉了），他就是说错了几句话，你们就打倒，搞错了方向，放走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拿出革命者的气魄，把北京搞好，我完全信赖你们，我们共患难，我可以坦率地提出意见，我不对也可以提。像这样，我们很焦虑，邮电大楼打，北大也打，这不对，乱贴标语，不能这样，

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军委《十条》是对左派极大的支持，极大的鼓舞，不能忘了维护解放军的荣誉。你们打内战，外国人登了。现在北京红卫兵自己打自己，成不了大器，那糟了，我不希望看到这些。你们能答应我不把武斗搞出去吗？（众：能）那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我先退席，有点感冒。（江青同志穿衣服时说：要允许改正错误，特别是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

伯达：要叫李钟奇、谢副总理的大标语、大字报明天就看不到，要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请大家继续发言。

姚文元：首先我完全拥护江青同志很重要的讲话。正如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小组在政治上、主流上是一致的，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面，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不容许任何人挑拨离间，不要上当。我赞同江青同志的意见，贴谢副总理的大字报是错误的，应盖上。

中央派我和春桥同志去上海，回来两次都感到很幸福。在北京可以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在北京的大、中学红代会的战友们应时刻想到自己的责任，你们的行动对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在上海听到北京红代会组织起来了，这是榜样。上海的红卫兵希望你们，你们的一些不好做法也会带给全国，希望同志们不要忘记，我在上海几个月是有很深感受的。

回答一个条子：昨天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文章和消息，我认为转载得好，转载的得对。听说有同学去人民日报要求解释这个问题，与今天这个事是有关的。当前的大方向是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中国赫鲁晓夫声势浩大的批判，是有伟大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对世界革命有很大的影响。挖掉修正主义总根子，挖掉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批判刚刚开始，要深入到政治、思想各界中去，对刘邓的批判使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著作都是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特别是和刘少奇战斗的。有刘少奇这个反面教员，显得主席更伟大，革命的大批判推动革命的大联合。现在集中力量，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是文汇报提出的重要问题。当前大批判可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个大批判壮大了无产阶级革

命派的队伍，使中间受蒙蔽的争取过来，分化瓦解保皇组织，旗帜鲜明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批判，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在其他方面这个批判也是起很大推动作用。至于有的同志有其他看法，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还有一点感想是局部和整体，要懂得全局（毛主席语录……）有人提摘桃子的问题，摘桃子只能阶级对阶级摘，对敌人是寸权必夺，夺回到毛主席手里，而不是为自己小团体夺权，这在上海有体会。在革委会成立前，有这些问题。北京应按伯达、江青同志讲的自我批评来解决，不要影响全局，不要影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局。我们希望北京建立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权力机构，一切革命同志要维护其代表性、权威性，希望也早点建立，对全国有促进作用。

还有一点感想，在夺权前夕（上海），红革会要另搞一套，中央文革有电报，他们分析是假的，是××和张春桥一起搞的，我看有些同志，应从红革会吸取教训（从正面讲），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实际出发，从毛主席教导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看问题），无产阶级科学性是毛泽东思想，离开毛泽东思想就无科学性，应按毛主席教导去做，在重大历史转折时对我们都是考验，是否公字当头，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放在第一位，我希望在座的同志都很好地考虑，把北京搞好，给北京，给上海做模范。

康生：近来对北京情况了解很少，各地各大区情况了解，青海、四川、内蒙的问题及其他大军区的问题。在支左中绝大多数是站在无产阶级正确立场上，是好的，从接触中，在某些军区少数同志，在支左中有些错误，这种错误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好人做坏事，另一种是坏人做坏事，如青海的赵永夫 2.23 事件很坏，是我们的敌人，不是同志。其他很多地方大概都是好人犯错误，在这次解决问题中，我再说一下，某些解放军个别犯错误，同志们不要动摇对解放军的信任，动摇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1.23 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这是我们文化大革命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措施，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重要措施，这一点，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毛主席讲：文化大革命靠什么？一群众，二解放军，三，绝大多数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如果只看到解放军个别人个别事

犯错误，因而动摇对解放军的信心，要犯极大错误的。应看到 1.23 号后的五条，28 日的八条，2.11 的（十条）经过中央、中央军委讨论过的，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军管、军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现在我们解放军担任支左、支农、支工、军训、军管，没有经验，因为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有些不可避免，指出改了就行了。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这一点，无论我们看什么问题也不能离开这一点，更不能有意无意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解放军。我讲这些，并非说北京同学犯了这方面的错误，而是讲两个问题，北京各校要纷纷到各省，特别是青海、四川、其他地方。当然，青海允许有些人去了，不要因此不相信当地解放军还能执行毛主席的命令，能支持左派，希望同学们解释，同志们心是好的，去支援当地的革命派，但需要统一行动、听中央意见。如果需要，中央会叫你们去的。2.刚才江青同志所讲的，我们出现一种苗头（对准解放军问题）首先对谢副总理贴大字报，谢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谢副总理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军委的常委，谢副总理是解放军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个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同志们随便写大字报传单上街，这是极大的错误。说谢副总理是邓小平的什么人（××插话：谢副总理是最早的用文字揭邓小平的问题，斗争很坚决。）这种东西出现是罪恶，是我们的耻辱。当然，同志们一时冲动，立刻觉悟，自己搞掉了。昨晚谢副总理向我汇报了昨天的情况，准备解决问题，地院东方红没有遵守谢副总理的指示，出了 26 人，这种态度是不对的。谢副总理气量够大的，好些地方冲公安部都没发脾气，气量很大。昨天谢副总理不是退兵 30，而是 50，地院还不谅解，这一点，地院应当自我批评。今天听说贴谢副总理大标语，我认为一定是地院贴的，结果是北大，聂元梓有责任，聂元梓、孙蓬一我们挺熟。北京影响全国，北大的光荣，主席亲自批发北大的大字报，北大应保持光荣，应爱护光荣。应该检讨自己，应自我批评，应从思想上彻底肃清这种思潮。

据说还有贴关锋的大字报（关锋：多贴没关系）我不知道是谁贴的，从今天才知道，有人对中央文革这样推测，那样推测，还分几派。我们小组是一致的，怎能设想小组在毛主席领导下，经一年考验（关锋：现在没有王任重、刘志坚、陶铸了。）这样是很错误的，

对全国文化大革命很有害。另一方面，这事情也很怪，文化大革命初期，地质有薄一波煽动的保守派。师大是孙有余搞起来的，把林杰和关锋串在一起，他们的后台是某人，当时我连关锋也不认识。那是薄一波、孙有余搞的，我们造反派不应用这种手段，那是叛徒手段。对解放军千万要谨慎，不能有任何动摇，大概有的同志参与军区问题，没有军队，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

必须有阶级观点，敌情观点，上次给大家看了香港报，不是看到了吗？要警惕，遇事想到有敌人，有外部敌人，凡事敌人高兴的事，我们就不要做，凡是敌人不高兴的事，我们就做对了。不好的大字报、漫画、真理报像宝贝一样。我们面前有美帝，现在通过日本记者收集我们的大字报，日本记者懂中文，他们称赞日本记者，苏修不仅自己真理报登，国民党、香港常登塔斯社消息。要有阶级观点，敌情观点。如武斗，敌人高兴。武斗，黄色大字报供给敌人，照片低级的都给了敌人，现在开会，好一大串，牛鬼蛇神他们分散的，一集中好像他们样子大了，百丑图，本来一小撮，结果一大串，这些问题要动脑筋，好好想一想，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联动高兴。打砸抢不要搞，要自觉，违背自己诺言不是一件好事，三月比一月好，不要走回头路。

现在批判刘邓的同时，带着问题学，我感到过去学毛著不够，本来两条路线斗争很尖锐，自己不太知道。批判刘邓不是几张大字报小字报，几篇文章就解决了。天地宽极了，同志们有很大的用武之地。（戚：有个想法，像九评那样，搞重型炸弹，驳之体无完肤）希望同志们投入这场战斗。4.8事件和4.11事件比刘邓哪个大呢？哪个是主流呢，哪个是支流呢？北京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更应注意。有苗头不是大联合，而是打架，这样打下去，何时成立革委会？你们讲了团结，但还是打。这个事情北大首先检查自己吗？地院也应该检查自己吗？能不能自我批评这是接班人五个条件之一。街上小报上关于奴隶主义，有人（中央机关中）借反对奴隶主义拒绝执行中央指示。毛主席讲奴隶主义是在反革命、反动路线统治下，不作分析，不思考就听，这叫奴隶主义。对毛主席正确路线坚决服从也算奴隶主义吗？

最后，谈谈有人说谢副总理搞两面派，搞折衷主义，大家想想，什么叫折衷主义？韩爱晶不赞成北大也不赞成地院，这不是折中。不犯错误的人，并不是勇敢的人。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不要互相攻击，不要太不起头来。孙蓬一不要以为犯了错误就抬不起头来。

谢副总理讲话：

讲两句话，我的毛泽东思想水平低，有些事情就处理得不太好，有辜负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托。昨天小将们打架，我想调解一下，但没有办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小将们学习。办事要调查清楚。昨天我事先没调查，情况不大了解，还很急躁，主要地是批评了地院东方红，而且发了脾气，也批评了聂元梓，最后走的时候，也没有和聂元梓打招呼。同志们可以批评。北大贴我的大字报，我欢迎，这是一件好事，对我是有利的，文革小组的同志们是多方面考虑的。今后，我们还是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我可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缺点都可以批评，同志们不要感到有压力，我很感谢同志们。我对×××是坚定的左派，我有意见，就不太高兴。我很愿意跟毛主席干革命，但我觉悟低，跟主席不紧，错误很多，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也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提倡批评我，当然用什么形式可以很多了。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说几句，不要上大字报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到各机关、学校去，我们说是你们的小学生，今天我们还是小学生。大家，合起来的智慧比我一个人高得多，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向毛主席学习，向你们学习，向群众学习。

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处在斗争的前夕，我们的斗争是在胜利中前进！可是我们的道路并不是那么平坦的。尤其在这半年来，有很多情况说明了中央制定的十六条中所预见的运动中有曲折有反复的，这个预见是对的。但有曲折也没什么，有反复也没什么。只要我们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动脑筋思考，我们就能迅速改正我们自己的缺点错误。虽然这几天大家吵

架，打架，但我看还是一片大好形势，梁山泊好汉不打不亲热，我看打两下也好，不要伤筋骨就好了，伤些皮肤没有什么。以后会不会再武斗？我不敢保证。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刚才一个同学递条子让我再声明不要再打、砸、抢。我们什么时候提倡打、砸、抢？十六条早就讲了，而且还是毛主席写的句子：要文斗，不要武斗。但还是有武斗。大家对十六条是否很好看过，我可以怀疑一下，不要怀疑一切。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十六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公认的伟大文件。一个外国马列主义者说这是一个新共产党宣言，外国人都这么说，我们可以听嘛！无论如何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文件，是表达毛泽东思想的文件，所以大家还是要掌握这个文件，进行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文件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文件，要以它为武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刘、邓作斗争，这样讲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就不要把斗争矛头指错了，要针对刘、邓反动路线，针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针对黑帮，不要迷失大方向。

现在流行一种摘桃子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毛主席在日本投降以后提出来的，是指抗日胜利的桃子是落在人民手中还是落在美帝走狗蒋介石手中。在抗日初期，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就提出抗战胜利后是国民党的天下，不是人民的天下。那时右倾机会主义以王明为代表要把抗战胜利果实承送给国民党蒋介石，送给美帝；但是毛主席提出说不行，桃子应落在无产阶级手中，人民手中，所以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夺的方针。毛主席这样一个坚强伟大的路线为全党所接受，经过几年的解放战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了胜利，取得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胜利。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阶段，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我们无产阶级应当紧紧掌握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并把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并且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所以这是阶级斗争，不是哪一小团体和一个小团体的斗争。什么叫摘桃子？不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这个问题，就完全错了。因为，如果我们不进行文化大革命，就可能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果实就可能丧失掉了。这是保卫无产阶级果实，夺权斗争也是也是

保卫已取得的果实，把无产阶级取得的胜利继续推向前去。现在我们北京是无产阶级的首都，在一些学校、机关、工厂出现了摘桃子的错误观点，比如说我们这里，我们这个机关、学校，这个单位，例如北大、清华上上下下都万众一心吗？难道没有陆平吗？没有蒋南翔吗？没有黑帮吗？没有刘、邓代理人？没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那样万众一心吗？清华是这样吗？其他大学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教改也不要进行了，什么革命也不要进行了。这样看法不是用无产阶级观点看文革果实，而是从一个学校、机关来看，争夺文化大革命果实，这本身就不是无产阶级，是充满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我重复一下，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是无产阶级果实，无产阶级大联合果实，无产阶级独占果实，不是抽象的哪个人，哪一个小团体独占的果实。文革最重要果实是能否掌握毛泽东思想。我今天说这些话是包含着批评的，有些人很敏感，不要紧张，改就行了。

我们每个人都要在文化革命中得到锻炼，重新改造自己，不要以为自己完美无缺了，其实，说完美无缺的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可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还有个任务，是急需整风，要认真整风，不是敷衍了事的整风，三心二意的，你声音大，我声音大的整风。我有一次经过天津劝业场，两派，一派一边喇叭，这边声音大，那边更大，想这样办法取得胜利，这样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正好形式，喇叭车是资产阶级做买卖做广告的，适当时候可以用，靠这来压对方是靠不住的。

讲整风问题，要认真思考用头脑，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进步很快，有好多文章，当然，不一定是北京出来的，其他地方也出了些，上海出了，有些不是大学生、中学生，工人也出了好文章，这是文化革命很好的成绩。边战斗边整风夺“私”字的权，真正有群众运动的一定有新创造，在整风中一定会创造出无产阶级的新东西。

在座的最近这样一种吵闹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调子有点高，双方都当成敌我矛盾，进去的不示弱，打的也不示弱。可是现在已经进了，打也打了，不要懊悔，有的同志也不要哭了，不要灰心丧气，有错误，无产阶级对错误是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再犯，仅是避免，

能否再犯，那就不一定，以后打起来也有可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要互相戴高帽子，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几次会议都介绍了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是怎么处理山头主义的，就是要个山头作自我批评，当时有很多山头，全国有很多根据地，被分割着，大家都不认识，讲你的山头不好，我的山头好，这样怎能联合呢？我们的山头再好也有缺点，你们的山头再有毛病也还有成绩，不然的话怎么能和敌人作战，能保存下来了，一定有成绩，这是群众的成绩，群众的东西。当然不是说各自霸占一个什么山头，只是一个比喻。各个山头要作自我批评，不一定批评别人，今天都恨不得把别人推倒，那怎么能大联合？毛主席的关于克服、处理山头主义的方法，以自我批评为主，不批评对方，可以善意批评，我们提意见应抱着商量的态度，留有余地，而不是命令的态度。你们各个山头能这样做吗？各有长处短处，应吸收对方的优点，自己有优点就不要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这种神气不对头，建议你们多开联席会议，互相商量，如果争吵得厉害，双方人数可以相当，其实能够得到最后胜利的，还是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靠拳头，不管你拳头再大，力气再大，不是真理也是不能胜利的，北大把喇叭打坏了，这不对，这是国家财产，劳动人民创造的。谢副总理的问题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很难理解，前几天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孙蓬一谈了三句话（用电话）：北京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模范首都，大家应该联合起来，不要武斗，建立新秩序。不应当给谢副总理贴大字报，在文化革命中他干了很多好事，为什么要这样搞他，那时只知道你们武斗，不知道搞到谢副总理头上来了，目的何在呢？这样做对国家影响不好，现在马上把这些大字报搞掉。

关锋是文革小组成员，是《红旗》副主编，大家知道，我很官僚，我就请他管常委、编辑，实际是王力和他共同负责，他们是副主编，做了很多工作，很有成绩，如果说最近《红旗》的文章受群众欢迎的话，他们是有贡献的。

……把我和关锋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我和王力、关锋同志是一起工作的（伯达同志说还有戚本禹同志，伯达同戚的一段对话，没给翻译）不要以为在这里有什么空子可以钻，要走大路，不要走小斜道。有意见可以提吧。■

原载《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编印 1967年11月）

【资料】

陈伯达 1967年6月5日的讲话

时间：1967.6.5晚—6.6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的十五所高等院校的委员，红代会的工作人员。（按当时记录整理）

陈伯达同志一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陈伯达同志摆摆手说：别鼓掌了。怎么又打起来了？怎么又打？你们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当流浪儿。我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反对你们，都得罪你们了。我反对你们最近的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资产阶级的灵魂，我替你们难过。刚才去参加亚非作家学习毛著的会。现在凡是有打架的地方我就去，我准备去挨打，我是不怕别人打的，你们尽是鼓掌我已经不喜欢了。记了有什么用？不听也不执行，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你敢字当头。）（这时大家反映红代会没有经过核心组讨论就吸收了十八个组织）你们要经过正规的讨论、民主的讨论。不能随便

开除，也不能随便地吸收。（同学们反映今晚有人去“首都红卫兵”报，在那里发生了武斗。）（谢富治：你们公开批评北京日报，这是对的吗？某些大学去某些单位打砸，这是对的吗？我反对。）以后凡是打、砸、抢，不执行通告的要罢免。我以一个公民、一个小老百姓的身份提议：如果革命委员会委员不执行这个通告时要罢免。大家这里举手通过，出去又反对，要罢免，你们来造我的反好了，出那么多的报纸，别以为你们的文章了不得，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我不看，北京日报我也不看，（这时同学把一个取缔“首都红卫兵”报的通告送给陈伯达看）这个通告很不好，老百姓给你们吃饭，你们不好好地学习，要干架。现在我反对你们，这个通告写的很糟糕，这样在街上贴出去很不好。我没有看“首都红卫兵”报，但是这个东西贴出去是会是什么影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你们是××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的话也不听了。你们原来还比较朴素，现在骄傲了，也搞打砸抢，无产阶级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吗？打砸抢搞个人发财。你们的手表是抢来的吗？如果是就拿出来，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办。（这时伯达批评轻工红鹰朱成同志参加武斗了，朱成立起来说轻工七.二九已经辟了谣：“说朱成没参加武斗”）我批评错了，你们可以指出，我是老百姓的奴隶，不是地主的奴隶，也不是奴隶主的奴隶。我比老百姓还小得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们的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眼镜、茶杯、衣服、房子、工具、钢笔、纪念章、纸张，都是怎么来的呢？想一想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们能打架？这是起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识，一个普通劳动者必然懂得，你们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人民代表？什么是人民勤务员？你们要想一想，凡是你们打架的地方我都想去，让你们打死引起你们的警惕，引起你们的觉悟就好了。（谢富治：我也准备被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够觉悟这也是我的一点贡献。）你也有这个决心啊？我很难过，替你们难过，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首都都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谢富治：可是两派都要把红代会搞垮。）不要受坏人煽动，不要受自己坏思想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

革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谢富治：现在有些人私字挂帅，很严重。）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要造你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谢富治：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别人都不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以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那不一定，听说付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付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象刘邓路线吗？去年对外文委找到我家去，我老婆接电话，问他姓谁，名是谁，做什么工作，后来接到许多信。我去看大字报，张彦这个工作组把与我一起走的都打成了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的后台老板，几十个反革命的后台是陈伯达，其实那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我没与他们谈话，更谈不上反革命，后来周总理派康生同志去调查，把他们放出来，有的人都精神失常了。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故意闹，把事态扩大，要中央文革接见，我准备去，让他们随便踩死，献出一个人的代价，我年纪太大了，又没有用，说话还要翻译，让你们打死也好。你们要想想这个问题。（谢富治：不，你有用，我打死不要紧，你有用。）我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我是讲真的，不是假的，不管你们理由有多少，打架是不对的，市面上被你们的喇叭车吵得够了，老百姓都有意见，中国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要走哪条路？你们要夺多少权？你们比我们小时候还糟糕，我们小的时候在群众中生活，你们没有与老百姓见面，世界的事你们了解的少。岁数小不要紧，毛主席希望你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能不能做，看你们自己，用打砸抢就能把谢富治打倒了？你们现在要准备条件做接班人，不是现在做接班人，你们脑子中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很深的，要革掉这些灵魂，中国就可以不变色，不然，还是要变色，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

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们现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两派这一派对付那一派就是刘邓路线对待群众的办法，我们天天为你们着急，替你们忧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你们登了台，这样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义，这样搞下去就得搞修正主义。（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自以为是英雄，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还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谢富治：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们两派，不论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得罪你们这些委员老爷了。（谢富治：不是得罪，而是帮助。）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入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中学生你们也不要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我昨天批评了××不听毛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都不听，非得要去搞分裂，公开批判北京日报，听说有人要批判红旗和人民日报，我前天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有人用联动的口号说“活着干，死了算。”不知是为了哪个阶级干？不讲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以后你们再闹我就不接见了。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谢富治：这两句话回去以后要好好讨论）这完全是投机倒把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交易所的思想，蒋介石原来就是交易所的，你们的头脑中有一种空隙，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吹进去，资产阶级的风会吹进去，不压迫它，它就要扩大地盘。你们到处插手，我们准备被你们打死，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加入红代会要开展民主的讨论。（谢富治：他们都各自拉一派，把自己观点相同的一派拉入红代会。）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现在苗头就是这样。你们去煽动工人，也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加入红代会要民主讨论，由市革委会批准。（谢富治：我们不去管他们的事。）（红代会的工作人员说：红代会的大印已经被抢走了。）

印被抢走不要紧吗，我们不要印。中央文革就没有印。你们有帮有派，我们没有。没有印也可以照常办公。你们可以轮流参加红代会。一个学校分两派，轮流参加。（有的同学问：保守派参加行吗？）保守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有工作人员说：保守派进来，那么红代会不成了大杂烩了吗？）什么大杂烩，难道今天跟你们的谈话就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大杂烩，难道你们就是造反派了。你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造反派，我大概就是保皇派了。因为我保谢富治。我常常从最令人瞧不起的人那里得到真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一个贫农妇女，是被人瞧不起的，开会没有发言权。有一天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问她你住那里。她说住在蔡家庄。又问：村土改了吗？她说：搞是搞了就是没有与群众商量。这就是恩赐给农民。我受很大启发，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她出的。这篇文章都说写得好，现在看来还是很蹩脚的，只不过引了毛主席许多光辉的话，这些话是很精彩的。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十三岁时是读私塾的，我的叔祖父是个老学究，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写文章，我瞧他不起，他六十多岁了，他把我的文章改的一塌糊涂，八股调，我觉得好笑，他就打了我的头，很疼，当时我很生气，现在倒是很感谢他。他打我头脑清醒了一下。他的话就是不对也不能不尊重，显出嘲笑的样子来。现在我是把你们当作孩子看待的。要是过去读私塾，非打五十大板不可。我父亲打我，他是私塾先生。你们抢印这是资产阶级的小动作。我再讲一个故事，你们知道黎元洪吧，曹锟是逼他让出总统的位置，把他驱逐走了。黎元洪的老婆偷偷地把印带走了，曹锟这时就着急了，派人去把印抢回来，其实这是多此一举，黎元洪的老婆偷走印，曹锟再刻一个，还不是照样当总统吗？我先讲这个故事，你们后交印，你们是不是想当曹锟的部下？把印交出来，由办公室的人使用，谁去值班谁就用，别抢。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动作，旧社会的恶劣作风，地主、资本家的作风，你们以为把印抢走了，总统就可以当了吗？南京也有一个故事，夺了一口袋印，什么办法也没有，工业不行，农业也不行，只好交出去。你们把所有的印都交出去，既往不究。要容纳有不同意见的组织来参加，要扩大红代会，所有两派都

参加。或轮流参加，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外贸学院东方红反映，说他们原是一个东方红，在外单位的支持下，分裂出新的东方红。）京西工人现在讨厌学生了，你们在那里以先生自居，制造分裂，现在都应该回来。（这时××同学写了一份决心书，伯达同志读了。）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很好嘛。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北大有缺点做自我批评，地质也是如此。新北大要做模范。有没有北大的同志在？（答：有。）你们别组织两大派斗争，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别用这些话去贴大字报，去攻击新北大，不准往街上贴新北大的大字报。我们这是内部交心，红代会内部做自我批评，不要把对方当作死对头，用自我批评，只有资产阶级才相互攻击，要爱护新北大，不要损人利己，不要大喊大叫，你们注意，不要打垮新北大，我没有这个野心，我现在作为红代会的一员来说话，我是代表个人，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今天的讲话，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知道就行了，不准拿出去攻新北大，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

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以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原载《毛主席的新北大》(新北大公社火车头编辑部编印 1967年11月)

【读者来信】

1. 敖本立纠错

《记忆》第142期《王大宾回忆录》（序）中，有这样一段话：“《王大宾回忆录》根据这个认识，回忆和反思了他的文革经历。王大宾是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北京地质学院在文革中成立的“东方红公社”，以及由他发起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为文革破坏旧秩序阶段反工作组派别的旗帜和先锋队。”这里的第二个“他”本来是表示事物的“它”，贵刊的编辑改成了“他”，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序言的意思是，北京地质学院成立的“东方红公社”发起成立了“首都三司”。贵刊这么一改，就成了王大宾发起成立了“首都三司”。特此说明，并请更正。■

2. 漂木谈章铎所著《我所了解的孙蓬一》一文

《记忆》第139期章铎的文章很全面。说明北大有研究者很用心的。在谈论北大文革的文章中，她和胡宗式是最诚恳，最认真的。我觉得一个具体单位，难以用与中央某个大人物有保或打的关系，来判断是非曲直。关键是校内自己的问题。直至现在，我还不清楚北大的运动骨干们，为何会分裂出誓不两立的两派？■

3. 荷兰小庄谈当年看电影

这期电影专辑阮哲的那篇文章让我联想多多。我和他同龄，同样是在“大院”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童年和少年时光的。《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巴顿将军》这些内部电影我也是像他那样想尽各种办法混进大院礼堂看的。我们这代人经历的那些，现在的80，90后们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来的。

还有对《春苗》和《决裂》的记忆，尽管有近40年的时空间隔，当时的情景依然鲜活地留在脑海，不曾遗忘。之所以记住电影《春苗》和它里面的主题歌（现在还会唱），是

因为影片的男一号达式常,他让我这个13岁的女孩儿第一次有了朦胧的对异性的迷恋。《决裂》是学校组织看的,之后还要学生们写观后感,而我把观感写得“文采飞扬”,自鸣得意之余,还拿着手稿在家中四处摆显,引来我妈和我姥姥的一番冷嘲热讽。当时的情景如今历历在目。情窦初开少女的“青葱岁月”!

《记忆》选登这样的文章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儿。我们的史书上历来都是记载正统官家的那些“正事”,基本没有各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相关描述。阮哲文章的历史记述,为后世的人们了解当年历史全貌提供了生动而详细的证据,这类文字越多越好。■

4. 拾之：电影局所在地非冯恕所捐

贵刊141期《周扬关于《荣誉属于谁》对全局干部的讲话》一文中的有一个注释：“文化部电影局。地处当时羊市大街路南，四进大院，是书法家冯恕于1949年后捐献给国家的一所大宅门。”此说不确。实际情况是，冯恕1948年即已去世，1950年后代分家，宅院绝大部分被卖给电影局，留一小部分自住。■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